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6
1959

目录

正确認識和运用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	雷明(1)
談当前人民公社的产品分配	继迅(7)
論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兼談应屆高、初中毕业生投考师范专业問題	张其光(11)
从知識发展的規律性談学校学习的几个問題	王威宣(16)
观察形势，当机立断	万发云(20)
全面地历史地評價苏軾 ——对“苏軾試論”与“几点意見”的意見	艾治平(23)
应该如何評價曹操	戴裔煊(27)
試論明代矿业中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	李龙潜(32)
工人学理論的方法問題	集名(38)
怎样正确理解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 ——与梁克同志商榷	房松 郑凌华(42)
提倡活讀書	章沛(45)
幽灵在徘徊	岑桑(46)
为什么要开展第三类物資交流？(問題解答)	张思强(49)
評介“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书刊評介)	朱玉德(51)

动态

广州学术界广泛開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发表二周年的紀念活动
广州經济学界討論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問題
广东心理学界联系实际写成一批論文
广州学术界对曹操評價問題的討論逐漸深入
广州市举办“工人业余理論学习講座”
广东师范学院討論何正关于价值規律的錯誤論点



正确認識和运用国民經济有計劃 按比例发展規律

翫 明

經濟規律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但它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經濟发展过程的客观必然性的。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为私有制所分离的生产者，受着經濟規律的自发的作用支配着。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門各个企业联合成为統一的国民經济的整体，人們就有必要和可能認識社会主义各种經濟規律的作用和它們之間的联系，运用經濟規律来为經濟建設服务。在当前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地发展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地認識社会主义的客观經濟規律，發揮全体人民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客观規律办事，以保証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有关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的劳动分配和生产資料的分配必須有一定的比例，是任何社会形态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一个要求，沒有一定的比例，社会生产就不可能进

行。在社会分工愈細、生产社会化程度愈高的社会里，对这种一定比例的要求就愈严格。

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規律发生着作用，沒有統一领导和計劃整个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正确比例的条件，因此，“生产发展中的必要比例，是通过經常的波动、比例失調和反映着資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发地达到的。”^①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資料公有制使各个部門各个企业联合成統一的国民經济的整体，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发生着作用，要求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遵循着同一的目的。党和国家政权就有必要和可能有計劃地領導社会主义的国民經济，制定正确的經濟政策和措施，自觉地规定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的劳动分配和生产資料分配的正确比例。

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的要求是：一切經濟部門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統一計劃領導，遵守国民經济各部門和各种成分

^①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人民出版社版，第464頁。

之間的比例。党和国家政权以对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認識为依据，实行社会主义国民經济計劃化，实现对国民經济的計劃領導。国家計劃机关所制定的国民經济計劃必須尽可能正确地反映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国民經济計劃不能正确反映这个规律，人們的实践违背了这一规律的要求，就要使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正常的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就要遭到影响或破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們有可能深刻地正确地認識这一规律，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规律的要求經常使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保持着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特定阶段上特定政治經济任务所要求的比例，从而使社会主义經济获得迅速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經济的优越性的表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因为政权是握在我們手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因为我們进行着計劃經济，有計劃地积累資源，并按国民經济各部門来加以正确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义所患的那种无可医治的病症。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們具有决定意义的优越于資本主义的地方。”^①

社会主义經济的这一优越性，可以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国民經济发展的速度得到証明：例如在最近五年（1954—1958）来，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而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則还不到3%。苏联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較1913年增加了35倍，其中生产資料增长了82倍，消费品生产几乎增长了13倍。我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国民經济恢复阶段和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取得了伟大的成績。在国民經济恢复阶段結束的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44.9%，其中生产資料增长了2倍以上。第一个五年計劃結束的一年（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41%，平均每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資料增长了2.2倍，平均每年增长26%；生活

資料增加了89%，平均每年增长13.5%。1958年工业总产值又比1957年增长了66%，其中生产資料增长了103%，生活資料增长了34%。1957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25%，平均每年增长4.5%。而在資本主义世界如何呢？以美国來說，在1929—1955年間，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是增长3.3%弱。其后几年没有什么进展，1958年反比1957年还大約降低了6.5%。

上面的事实証明了，由于实行了計劃經济，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一切国家的国民經济都获得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各国經济建設的实践充分体现了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經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性。

二

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书指出，保証社会主义国民經济的必要比例的先决条件是：

（一）国民經济各个部門——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及其組成部分的发展的正确比例；（二）生产和消費、积累和消費、物力和財力之間的正确比例，居民貨幣收入总额和商品流轉額以及为居民提供的各种服务之間的正确比例；（三）现有的干部人数和国民經济所需干部人数之間的正确比例；（四）根据經济区的綜合发展，广泛的劳动分工，以及整个国民經济范围内各地区間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来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合理配置。国家在制定各級国民經济发展計劃时，必須照顧到上述各种比例来规定劳动和生产資料的分配。但社会主义經济中按比例的性质，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规律的要求决定的。而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规律的要求的实现，也要受社会主义发展特定阶段上业已达到的生产力发

^①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第439頁，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

展水平和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政治经济任务所制约。因此，国家计划机关在具体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各种比例时，就得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考虑其他各种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政治经济任务的需要。这当然是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我们在此只想讨论一些基本原则，以使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办事总要有——一条纲，找到了纲，就可以纲举目张，带动其他。同样，在规定这些比例时，也要有一条纲，也就是抓住最重要的比例环节。这个环节首先抓住了，其他的比例就有了安排的依据。

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比例是什么呢？首先是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也就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为了正确地规定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必须考虑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要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然是高速度的。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不断地、高速度地发展，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的连续过程。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是扩大消费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生产资料的优先发展，就不可能有消费品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的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有效的，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发生效力。“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① 我们知道，计划国民经济是以一定期间的社会生产水平和劳动力数量的水平为基础的。所谓一定期间的社会生产水平，是在一定期间内（例如一年

内），国民经济各部门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总量——社会总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来说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计划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速度时，首先就要规定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正确比例。规定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正确比例的依据，是从社会总产品中除去补偿两个部类的生产资料的消耗外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并根据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要求规定两个部类之间的投资比例。这里就要考虑到居民货币收入总额和消费品的供应总额以及为居民提供的服务之间的正确比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比例，劳动力数量分配的比例，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之间的比例，等等。这样，就能有纲有目，纲举目张，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的可能性，在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可能提供比以前其他任何社会经济形态更多的积累，并且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可以使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在有计划地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首先是重工业的生产的同时，又适当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对消费品的需要，使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得到合理的调节，既避免了社会劳动的浪费又促进了生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所规定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工业与农业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去年国民经济发展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正是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的光辉范例。

由此可见，我国发展国民经济所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巨大成绩的取得，绝不是仅凭人们的主观

^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73页。

愿望所达到，而是深刻地認識和自觉地运用了社会主义的客观經濟規律，发挥了全体人民的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遵循着客观經濟規律的要求而获得的。

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規律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物力、財力、人力分配的比例必須考虑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規律的要求。党和国家将增产节约作为发展国民經济的經常的方法，是正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經濟規律的相互作用的。首先因为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扩大再生产的規模，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大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規律要求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优先发展生产資料的生产。而增产节约則是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次，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規律要求不断节省工作時間、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要求合理地經濟地利用資源以保証生产的不断地迅速发展。因此，在确定資金的使用与分配比例时，必須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性的投資和考虑到投資的經濟效果。例如，要求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設开支，节约行政开支，节约企业中非生产性的开支；要求在生产中經常注意节省原材料，减少每一单位生产的原材料平均消耗量等等。与此相联系，还要求因地制宜，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条件，消灭不合理的远程的运输，尽量使生产接近于原料产地和燃料及动力資源；要求各个經濟单位，根据各自的經濟条件和自然条件实行分工协作；要求經濟协作区根据經濟区域的綜合发展有計劃地配置各地区的生产。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规定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方針：“根据国家統一計劃和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則，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无论那一方面的生产和基本建設中，都必須厉行节约，精打細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

和財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員因为丰收而鋪张浪費的现象。”以及第二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都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和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規律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說明了党和国家所制定的各种經濟政策和措施，是以深刻而全面地認識社会主义的客观經濟規律的作用和要求为基础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經濟不断地高速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这些經濟政策，体现出党和国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利益而自觉地正确运用着被認識了的客观經濟規律。

三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了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客观性，都能自觉地利用經濟規律为发展国民經济服务呢？并不是这样。

例如，有人对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和社会主义經濟高速发展的規律性的相互关系就存在某些不正确的認識。有些人認為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要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高速度，既要高速度就不可能按比例发展。这些人把它們之間的关系看作是对立的而不是統一的。其实如前所說的，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正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得以实现的条件，有計劃按比例发展正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要求的；离开了高速度，有計劃按比例发展就失去了內容，而离开有計劃按比例，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优越性，正是表现于人們有可能深刻而全面地

認識和自覺地利用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實行計劃經濟而達到了高速度發展生產的要求。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也証實了這一道理。去年我國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偉大成就，不正是由於遵照黨所規定的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幾個并舉的方針而獲得的嗎？根據幾個并舉的方針來計劃國民經濟，不僅不是離開有計劃按比例規律而恰恰是正確地自覺地運用了這一經濟規律。如果我們在實踐中違背了這一經濟規律的要求，譬如只發展重工業而忽視了輕工業按正確比例的發展，或只發展工業生產而忽視了農業按正確比例的發展，或只發展工農業生產而忽視了交通運輸按正確比例的發展，那麼，社會購買力的總額和社會商品流通總額就不能平衡，勞動人民就購買不到需要的消費品；工業得不到所需要的由農業生產所提供的原料和糧食；工農業生產得不到交通運輸的配合；整個社會生產就會受到阻礙，高速度發展就不可能實現，成為“欲速則不達”。另一方面，如果不以高速度發展的要求來規定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不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將積累過多地放到消費資料的生產，社會再生產就只能停留於原有的水平而不能擴大，不能滿足人民對於物質、文化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就違反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所以，計劃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發展，既要符合於高速度發展的規律性又要遵照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這不是人們主觀的臆造而是客觀規律的要求。

又有一些人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和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帥之間的關係也存在某些不正確的認識。他們認為，既要按比例發展就應當各部門平衡發展，不應當有主帥，有主帥就會破壞正確的比例。這是沒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主席指示我們：“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

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①在計劃國民經濟時，同樣必須捉住中心環節，就是捉住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就以它為主帥。沒有主帥，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就失去中心，無從規定正確的比例。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和毛主席提出“全國一盤棋”的方針，正是體現這種既有中心又有各部門之間的正確比例的范例。一盤棋中必定有一個主帥，全盤棋子才有個中心，下棋才有所依據，沒有了主帥，棋子就不能走。而光有一個主帥，沒有其他的棋子各據各位，由其指揮，這個主帥也當不成。例如我國去年發展生產，以鋼為綱，有了這個綱，就能帶動其他部門，推動統一的國民經濟的整體有計劃按比例地向前發展。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時，黨和國家計劃機關，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其中關於社會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要有一定比例的原理和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原理，把鋼、煤、糧、棉確定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四大指標，一切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均要圍繞着這四大指標而定。鋼和糧，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两个主帥，這並不排斥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恰巧相反，只有其他各部門的相應發展，才能使鋼和糧的指標得到實現。因此，“全國一盤棋”的方針，也是正確地反映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

此外，有些同志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同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的關係也有不正確的認識。他們認為既要遵照有計劃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88頁，1953年版。

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经常的绝对的平衡。因而在实践中就束手缚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不愿冲破旧的平衡，结果是陷于右倾保守。国民经济计划需要不需要平衡呢？当然需要。但是国家的计划工作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正确，计划工作中的平衡就不可能绝对正确地反映这一客观规律，计划中的平衡必然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其次，既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规律有密切的相互作用，在实践中，发挥了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新的先进指标就要求突破旧指标，要求落后赶上先进，形成新的比例关系。因而，国民经济计划就必须要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修改，冲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所以，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旧平衡的不断被冲破，新平衡的不断形成，才能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地高速度向前发展。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中报告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任何平衡总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绝对的平衡是没有的。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的任务。”

综上所述，可见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运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今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广州学术界广泛开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二周年的纪念活动

六月十九日，是毛主席的著名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的二周年，广州学术界将于六月中下旬广泛展开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学术界和机关干部进一步明确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意义，推动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研究。纪念活动的中心内容，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倡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纪念活动是由广东省社联筹委会组织和推动的。在六月中旬分别组织二次学术报告会。同时，还将于六月下旬分别举行三个座谈会：由广东哲学学会和“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联合组织并邀请哲学工作者，以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为中心内容，座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心得和体会；由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历史学会和“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联合组织并邀请学术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主要内容是结合各自的工作，座谈学习毛主席这一讲演的心得和体会；由广东省政协学习委员会组织并邀请各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毛主席这一著作中的“知识分子问题”部分举行座谈。

談當前人民公社的產品分配

繼
訊

人民公社這一嶄新的社會組織在我國農村建立起來以後，農村中的經濟生活發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的變化，其中特別是關於分配的問題。因為分配問題，是人民公社經濟的重要方面，它不僅關係着人民公社生產的發展，社員生活的改善，人民公社制度的鞏固和發展，而且涉及到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公社的分配問題，就成為當前農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之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導我們，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社會物質資料再生產過程的四個環節，它們是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統一整體。在這個統一整體中，生產起着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它決定消費、分配和交換，而消費、分配和交換又反過來對生產發生作用和影響。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說：“……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和交換，以及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的關係。當然，生產在其片面的形式上也被其他要素決定”。^①這表明了生產與分配之間的辯證關係：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又反過來影響生產。生產之所以決定分配，首先是因為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決定產品的分配關係，馬克思說：“消費品的任何分配，始終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的分配的後果。”^②其次，是因為分配必須是在生產的一定成果

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不生產出任何產品，當然就沒有什麼分配，也不產生分配的問題。因此馬克思說：“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就是生產的一種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因為能分配的只是生產成果，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因為參與於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着分配的特定形式。”^③然而，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分配雖然決定於生產，同時它又反過來對生產發生作用和影響。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首先，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不能一刻停頓的，而社會的不斷再生產，有賴於進行產品分配時，對於生產條件的安排。這是生產的前提，又是分配的結果。這裡表明：生產條件的分配，是直接影響生產的規模和速度的。例如不把更多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用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就不能實現不斷的擴大再生產。並且隨着生產條件分配的變化，生產也必然發生變化，這正如馬克思所說：“隨着分配的變更，例如隨着資本的集中，隨着城鄉人口的不同分配等等，生產也變更。”^④其次，產品分配，必然直接間接的關係到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影響社會成員對從事生產的興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的社會成員是從不同的個人利益對生產發生興趣的，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利潤而投資；勞動者則只是為了維持生存，才不得不去從事勞動。這就不能不限制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限制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生產是勞動者自己的事情，沒有資本家參加，實行按勞分配的

①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頁。

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23頁。

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頁。

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頁。

原則，就能够从物质利益上刺激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生产和分配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过来对生产发生作用和影响。根据这些道理，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也应当把分配同生产联系起来，从生产和分配的辩证关系来加以考察。

根据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人们对社会产品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归根结底取决于所有制和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人民公社在进行产品分配中，应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它的所有制的性质和它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现阶段我国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而且目前人民公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它所生产的产品数量还远远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因此，人民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怎样才能能够在人民公社中正确贯彻执行？由于目前人民公社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需要有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能不要经历一段必不可少的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也就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适应人民公社这种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各地人民公社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的管理制度。这就使得在人民公社的统一的组织中，在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个生产大队对于生产资料和产品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也有一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限，而生产大队又是分级管理中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可是在各个生产大队之间，由于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各不相

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多少也各不相同；在社员之间，由于劳动力的强弱和劳动的积极性各不相同，他们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就应该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从而在进行产品分配中，不是在整个公社范围内贫富拉平的统一分配，而是分级核算，各计盈亏，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保证在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做到多收多得，少收少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如果否认差别，不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企图用不等价的办法勉强使各个生产大队之间、各个社员之间拉平，就会发生一部分劳动者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情况。这就违反按劳分配原则，不利于发展生产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因此承认差别，分级核算，坚持按劳分配，执行等价交换，是现阶段人民公社处理产品分配中必须遵循的几项原则。正确贯彻这些原则就可以从物质利益的原则上刺激各级生产单位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并利用这种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和增加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和提高是有利的。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正确的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应当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缴纳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部分（包括用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不致减少。”从“决议”中这一段话的精神来看，人民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如何保证

在适当地扩大公社的积累的同时，适当地改善社員生活的問題。

人民公社的积累与消費的关系問題，不仅直接涉及到生产的发展和社員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涉及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結合問題。毫无疑问，随着人民公社生产的发展，产品的日益增加，用于积累部分和消費部分的产品都将逐步增加。但是从两者在分配上各自占的比重来看，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如果把产品过多地分配于积累方面或过多地用于消費方面，都势必影响另一方面的增长和提高。这就是說，积累和消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从两者的根本利益来看，又是統一的。两者都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都直接間接服从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最終目的。提高消費固然是直接为了改善社員的生活，增加积累也是为了发展生产，以便生产更多产品来满足社員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是积累与消費的辯証关系。各地人民公社处理产品分配的实践証明，凡是从公社现有的生产水平和社員的生活水平出发，正确安排积累与消費的关系，既适当的扩大积累，又适当的增加消費的公社，就可以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社員生活正确地結合起来，把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結合起来，发挥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巩固。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必須适当的扩大积累呢？这是由于发展生产和巩固与提高人民公社所必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決議指出：“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而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扩大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人民公社要高速度的发展生产、要在今后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公共积累。在可能的条件下，如果不逐步增加积累，而象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过多地用于消費，就不能高速度的发展生产，不能

使公社的生产不断的跃进，最終也就会妨碍社員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是不符合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群众的长远利益的。但是，在适当增加积累的同时，又要适当增加消費，以提高社員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社員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为了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公社在分配自己的产品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应该适当地逐年地增加社員个人消費部分和集体消費部分，以保証社員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逐步改善。而社員的生活得到改善，就能刺激他們生产的积极性，反过来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生产发展了，大跃进了，但积累过多，使社員的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改善，那就势必会降低他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繼續发展。

全国各地許多人民公社在处理积累和消費的关系中，对于积累部分的分配和消費部分的分配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其中对于积累部分的分配使用，首先是正确安排上繳公社的积累和留給生产大队的积累两者的比例关系。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集体，有它的直接經營的經濟事业和公共开支，这些公共經濟反映着社員的公共的、集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使人民公社的公共經濟不断的发展，各个生产大队上繳一部分积累給公社掌握使用是完全必要的。公社用这些上繳积累来发展公共的經濟事业和文化福利事业，主要是用来建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購置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举办公共性的农林水利基本建設。这些經濟事业大部分是直接为各个生产大队的生产服务的。公社公共經濟的强大发展，不仅将促使生产大队的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将为公社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奠定物质基础，逐步以现代技术改造公社的各个經濟部門，从而推动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发展和提高。而这些正是为了社員群众的长远利益。当然

由于目前生产大队仍是基本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核算单位，为了使生产大队的生产首先得到迅速发展，应该把积累的适当的一部分留给大队掌握使用，以供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其次是安排生产性建设投资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之间、以及生产性投资中用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各地人民公社在处理这方面的分配中，一般是把积累的主要部分用于生产性建设方面，而主要是用于农业方面。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公社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建设的投资，这方面投资愈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就愈大，发展的速度就愈快；而由于农业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主要方面，没有农业经济的正常的健全的发展，工业经济不可能获得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就应该把积累的主要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建设，以便在高速度的发展农业的同时，使公社工业健全的发展。

人民公社的产品分配，目前主要是用于消费方面。而消费方面的分配，又主要是用于个人消费方面，这样做也是完全正确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安排个人消费方面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关系。这首先是一定要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因为看到目前各地人民公社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供给部分中也部分地贯彻“按劳分配”，就认为供给制不好了，要取消了。这种看法和议论是不对的。与工资制相结合的供给制，是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适应广大劳动群众的迫切要求而产生的，它是客观形势的必然产物，不是任何人幻想出来的。这种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的萌芽的供给制，一经出现，就显示它的巨大作用。随着人民公社生产的发展和产品的丰富，这种作用将会更加显著。因此，我们应该以高度热情来对待这

一共产主义因素的萌芽，应该爱护它，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在坚持这一制度中，尽力“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的收入逐年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也不致比上年减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与提高。

其次，“决议”规定，供给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应过大，供给范围不宜过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使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占重要地位，在一段时期内占主要地位，并在若干年内，使工资部分的增长比供给部分更快。这一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拥护。因为目前人民公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产品还不丰富，社员的思想觉悟程度、社员之间的劳动熟练程度还存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如供给部分过大、增长过快，就会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更好贯彻，而使一部分人多劳少获，另一部分人少劳多获，甚至使一部分人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不能从物质利益上刺激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增加，也不利于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与提高。并且，目前人民公社的产品既然还不丰富，如果供给范围过宽，供给部分增长过快，以致把社员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包下来，不适当的过分扩大社员的消费，这就势必把公社产品的绝大部分拿来吃掉、用掉，从而影响公社积累的增长，影响高速度的发展生产。同时由于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的，还要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来与国家联系，如果供给范围过宽，就会使公社产品中自给部分过分扩大，当作商品来出售的那部分减少，这又不仅影响公社的货币收入的增加，影响工资的及时发放，而且影响公社对国家、人民的商品供应，这是不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的。

論人民教師的地位和作用

——兼談應屆高、初中畢業生投考師範專業問題

張其光

我國沿着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邁進，越來越需要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也就越來越需要培養大批人民教師。這樣，就必須對人民教師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否則，不僅妨礙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會影響國家經濟建設的進行。

黨和政府對培養人民教師是十分重視的。早在1953年九月間全國高等師範教育會議就強調指出：“……高等師範教育，是我們全部教育事業中一個重要環節。如果抓不緊這一環節，我們就要犯政治上的錯誤。問題的嚴重就是這樣的。我們高等師範學校工作的性質是培養人師，培養為人民作榜樣、為我們後一代作榜樣的人，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具體要求是要培養‘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基礎，高級文化科學水平和教育專門知識與技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教育事業服務的中等學校教師。’因此高等師範教育質量的好壞，就直接影響到青年一代的教育。大家都應該十分重視這一事業。”去年黨中央向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更提出：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而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建立一支成千萬人的（包括教授、教員在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今年大量招收高等師範和中等師範學生，這對於逐步實現上述任務顯然具有重大意義。可是，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我

們教育界和應屆高、初中畢業同學以至學生家長、會社人士普遍的足夠的重視。或者，更確切的說：我們還沒有十分認真從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來考慮如何更切實地幫助國家實現這一重要任務。

有不少應屆畢業的中學生不願投考師範學校，他們對於培養自己成為教師抱著一種深刻的疑慮，以為當教師沒前途沒出息，而且生活艱苦，甚至認為“當教師沒有地位，作用不大。”這確實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教師是不是沒有地位呢？回答說，從來就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問題在於：他們究竟在什麼社會中處在怎樣的地位？而現實的問題尤在於：教師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否有地位？

有些人愛把教師的地位作今昔之比，說什麼“今非昔比”。到底是不是？封建時代統治階級把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的中堅人物，備極推崇。清皇朝甚至把祀孔與祭祀天地同列為“大祀”，稱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這無疑是利用尊孔來提倡尊師崇儒。可是，無論封建統治者怎樣推崇教師，只不過為了更好的利用他們為封建階級服務；無論教師的社會地位多麼高，也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品、寄生蟲；儘管當時教師的名號何等顯赫，也不過幫助少數人去壓迫和欺騙多數人。

資產階級為了本階級的利益也要辦教育，目的在於培養一批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稍微有點知識能使用機器的工人，但在資本主義世界反而不象封建時代那

样注重利用荣誉来籠絡教师，资产階級利用資本利用金錢来使人为他們卖力与卖命，对教师也不例外。在那里，教育事业就是一宗大生意，知識就是商品，学校成了“学店”，教师的劳力成为买卖的对象，他們如果不是把劳力卖给資本家所办的学校，就是直接把知識贩卖給学生。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里教师的社会地位！資本主义社会把教师圈在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中，却又时常把他們挤到失业的困窘中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旧中国，教育成了买办奴化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教师来执行他們的反动的教育政策，給予人民及其子女以思想上的毒害，同时又替地主、官僚、资产階級培养他們所需要的知識分子，这种遗毒直到现在还未能完全清除。反动派利用教师为他們服务，又异常刻薄地对待教师的事实是不胜枚举的。在旧中国，不能說沒有具有正义感，愿为教育后代而認真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但他們却遭受着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痛苦和社会上的歧視，还要經常受到失业的威胁，簡直处在极其可悲的境地。他們身受反动派的奴役与欺騙，而又被逼成为欺騙、毒害青年儿童的工具，根本就沒有什么真正的“地位”可言。

不难明白，在旧社会里，当教育成为反动統治階級的工具的时候，教师要是被利用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服务，他們即使有什么“社会地位”，也不过为少数統治者所賜予。尽管旧社会曾經用过多好听的言詞来歌頌教师，资产階級又用过多少金錢来收买教师，都不足以作为真正表明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据。那末，我們能够在这問題上作什么“今昔”的比較嗎？恐怕除了过去的教师为少数人的統治階級服务而现在我們的教师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一点根本不同之外，就很难作什么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的比較了——那确是无可比拟的！

正因为旧社会，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旧中国，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教师生活困苦，不受人重視，职业不被尊重，以致許多人对今天的人民教师的地位，也还有許多錯誤的看法。社会现实改变了，但人們的認識一时还未能跟上去，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更有必要認真弄清今天人民教师的地位問題。

在新社会，教师的地位，是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密切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說，教师的地位問題与教师的作用問題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同一个問題。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定工作崗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这个特定的工作崗位上从教育人、传授知識和各种生产技能以及对学生的精神道德品質的培养和影响等方面，对社会發揮自己的作用。我們对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这个問題，应该从教育事业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角度来看，才能获得正确的認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社会工作崗位，都同样是高尚的。它們之間只有社会分工的區別，虽然也有着劳动复杂程度上的差別，但在社会面前，是一样的光荣和崇高的。我們不能用封建社会或資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来衡量某种职业的社会地位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按照封建社会的观点，要把教师抬高到“天地君亲师”那样高人一等，要求人們作伪善的礼待，才算是“有地位”。这样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确是沒有的。按照资产階級的观点，要以雇佣教师所支付的薪金多少作为衡量教师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这些都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的。

新中国給予了广大教师一些什么？既不是封建社会那种伪善的礼待，也不是資本主义社会那样驅迫教师从事贩卖知識的职业。首先，新中国使教师們同全体人民一起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翻身。首先在政治上改变了教师的地位，使教师能够同广大人民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人民教育

事业的主人。这种变化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底根本变化；这种根本变化正是教师的最大幸福，为教师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途。苏联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的“最主要之点——对美国寄来的履历表上问题的回答”有一段话：

“如果那位大人物确如杂志上（按：指美国的‘阿美利坚’画报和‘不列颠盟友’杂志）所描写的那样，是‘从人民中出头’，是‘从人民中出身’而成了贵族院议员，那末，我则是同全国人民一块出头，是同全国人民一块成了英雄的。主要之点就在这里。”的确，这给我们很大启发：旧中国的教师并不同人民一块出头，而新中国的教师同全国人民一块出头，教师的地位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主要之点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解放以来不少教师被人民选举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委员会，并和工人群众在一起评选劳动模范，广大教师更参加职工会，这都体现了教师同人民一块出头。这些说明了要认识教师的地位如何，应从教师同人民的关系如何来看。旧的眼光，以教师能“高人一等”为光荣、为有地位，而新的眼光，以教师能同人民一块出头为光荣、为有地位。至于那种要在劳动人民的事业中间“挑选”什么职业更有地位更加光荣的想法，不啻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有尊卑高下之分，就更不能不说是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了。

解放以来，人民教育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它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重要的地位；第一、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历年国家财政预算决算也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待赘述。为什么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重要的地位呢？为什么党和政府那么重视教育事业呢？这是由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它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够起重大作用；教育又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能够

起重大作用；还由于教育是培养人的发展的重要手段，它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有着重大关系。一句话，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十分需要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不能缺少教育事业，没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势必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了解到这些，那么，教育在今天社会的地位的重要，人民教师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地位之崇高与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教师的崇高地位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不仅这样，人民教师的地位的日益提高，还表现在党和人民对于教师的关怀和期望的殷切，多方帮助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进步。党根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和改造广大教师，并帮助他们同工农群众结合。毛主席在1951年说过：“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开幕词）这同列宁关心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修养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日记摘录”中写道：“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修养……”（“列宁全集”33卷第419页）所以，教师是否能够获得和保持崇高的地位，还得依靠教师自己的努力。同样的道理，青年同学们当考虑投身任何职业的时候，不应用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观点多方考虑什么职业更有地位，而要认真考虑国家的需要和自己应作怎样的努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只要努力对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就有“地位”。

有些青年同学又考虑到“当教师究竟有

多大作用”？那种以为什么职业比較更直接、“更痛快”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起更大作用的想法，这在許多抱着一颗追求理想的雄心的青年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未可厚非的。可是，在我們的社会里，这种比較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可能有绝对肯定的答案。既然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民所需要的社会职业，就在客观上有它的作用；至于作用的大小如何，那就应该看到，事情本身不仅存在着客观规定性，也同时存在着主观能动性。就是说：作用大小虽有客观上的规定，但还要看主观努力如何才能論定。

关于教师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是討論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作用，而是討論教师对社会的作用，那么这就意味着教师的任务和贡献，这当然首先决定于他們在教育工作上究竟对社会尽了多大責任，和对社会主义作了多大贡献。

人民教师負有极其重大的責任，那就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健全的公民，也就是培养他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师从事这样的工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人民教师应当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学生，应当以过去和现代人类所积累的知識传授給学生，使他們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要求对于人民教师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要求，教师的重大作用也正体现在这里。在这种意义上說，“承先启后”、“繼往开来”，也很能表述教师的重大作用。在我們的社会，人民教师确实“任重而道远”。不应当忘記，人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人民教师要为創造这些条件而發揮他們的巨大作用。

不能只看到人民教师工作的远大作用，而且还要看到当前所起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青年、少年、儿童占全国人口很大的数量，

今年在学的小学生就达八千六百多万人，中学生达一千二百多万人。这样众多的学生是离不开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家庭与学生之間不能沒有互相影响。教师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作用于作为直接教育对象的学生，还必然作用于同学生有着联系的家庭与社会。何况学校要坚持“開門办学”，它同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教师要指导学生参加許多社会活动，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校內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而应当同时成为社会活动家——真正全面地起他們所应该起的作用底人民教师，就应当这样成为社会活动家。

社会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尤其是在我們这个“一穷、二白”——經濟、文化落后的国家，工农劳动人民迫切地要求获得文化知識，生产发展对于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要求无限迫切。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后代多么急待人民教师給予他們大力援助。列宁曾經对教师們有过这样的要求和勉励：“劳动者渴求知識，因为知識是他們获得胜利所必需的。……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人們，优秀的教师們，都会帮助我們，——这就是我們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可靠保証。”（“列宁全集”28卷第70頁）这样对人民教师的作用底估价不为不高。确实是这样，只要人民教师把“工农群众知識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也看成自己的光荣任务，作出贡献，就无疑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天的学校教育，坚持貫徹向工农開門的方針，越来越多的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入学，将从根本上来实现“工农群众知識化”。所以，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站在工农劳动人民方面，忠誠地为人民教育工作而努力的教师，就是又紅又专的人民教师，就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不能說人民教师应有的崇高地位和重大的作用，都已为人们普遍認識，这要

有一个过程。即如有些人虽然看到人民教师的地位崇高、作用重大又生怕这份工作的艰苦，而他們并未体会到其中乐趣，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們从上一代接过了火把，弄得更光亮些，向下一代传过去吧！——似乎极平凡的人民教师能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即使艰苦一点，还是快乐的。

国家考虑到今后几年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今年高等师范院校招收新生特别多，約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着任务极其艰巨的文化革命。过去几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已遇到了師資缺乏的困难，这無論在数量上

和質量上，都是如此。去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全面大跃进，全国小学学龄儿童都已基本入学，跟着便要普及中学教育，否則就不仅不能在今后十多年內普及高等教育，而且不能滿足由于国家建設迫切需要而日益迅速增长的高等学校招生数字的需要。因此，现在就要大力发展高等师范学校，和普通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大量培养又紅又专的人民教师，以适应今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青年同學們必須正确認識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服从国家的需要，踊跃考投高等师范学校，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地参加到人民教师的行列里。

广东經濟学界討論

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問題

广东經濟学会于六月七日在广东科学館举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問題座談会，到会的有广州市財經部門的負責同志、理論研究工作者和各高等院校的教师等多人。

在会上联系我国当前实际，討論了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的必然性及其作用；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关系；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和价值規律的关系；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和国民經济計劃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民經济的比例、平衡与速度的关系等問題。在会上发言的有广州市計劃委员会副主任王冕农、广州市財政局財政人員訓練班副主任譚超白、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室主任戴枕、暨南大学經济系青年教师何永祺、周治平和中山医学院青年教师陈久双……等。他們都从理論上和實踐上提出了自己对上述問題的看法。

广东經濟学会决定繼續就上述問題举行座談，并有計劃地組織專題发言。

从知識发展的规律性

談学校学习的几个問題

王威宣

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跃进，对旧有的教育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改革，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成绩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有些学生自动组织学习小组，切磋琢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些学校因为没有认识学校学习的特点，没有认识学习即人的知识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例如：有些班级把学生组织成若干小组，成绩优良的帮助成绩较差的，进行“包干”；有的在学习上组织评比竞赛，提出“二个月内消灭二分，本学期内消灭三分”；有的提出：“消灭二分，争取优异成绩达到百分之九十”。甚至进行短期突击，提出：“苦战一周，改变数学面貌”、“苦战一月，攻下物理堡垒”、“分秒必争，三个月学完一年课程”等等口号和指标。

很显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对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不能不有一些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学校中学生的学习方法加以研究，以提高教学质量，更多地更好地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

学校学习的特点

学校学习的第一个特点是：除了生产劳动外，主要还是脑力劳动。那就是通过教师的讲授、通过阅读书本和实习，来继承前人总结的经验与知识。学校学习的过程并不

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课堂教学不是也不应该是智慧的漏斗，只是把知识原封不动地填鸭式地灌输给学生就了事，而是要经过学生自己的思考、观察、反复推断，才能消化、吸收。所以，学习的过程首先是个艰苦的脑力劳动的过程。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的门口，正象在地狱的门口一样，必须提出如下一个要求：‘在这里一切的疑惧都须抛弃，一切怯懦的念头在这里都须化除’。（拉丁：神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343页）马克思把科学的大门比作地狱的门口一样，这说明要掌握科学真理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学习，必须花一定的心血，否则，就不可能使我们攀登文化科学的高峰。所以，每一个要真正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人，除了直接参加实践之外，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必须从书本上接受他人实践中积累的知识，而就在学生的学习来说，主要是从后者吸取有用的知识。

“在科学上是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经过辛勤的艰苦的劳动，才可以到达科学的顶峰。

学校学习的第二个特点是：必须依照科学的系统性，循序渐进。科学知识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在学习学生的学习，如果要学习得好、学习得深，必须严格遵循科学的系统性。我们要学习关于高等数学知识，必先学习代数、几何、三角等知识；要学习代数等知识，又必先学习算术；算术又有它自己的

科学系統性。不先学加减乘除四則，就不能学分数。学生在学校里所学习的功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高等学校，正是要掌握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最起碼的基础知識。只有把最基本的功課学好，才能为今后做更高深的学問打下必要的基础。如果企图在学习上也来个三級跳远，其結果将是“揠苗助长”，适得其反。苏联有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給青年們的遺书中写得好：“我对于我国献身科学的青年們的希望是：首先，要循序渐进。……你們从一开始工作起，就应在积聚知識方面养成严格的循序渐进的习惯。你們在想要攀登到科学頂峰之前，务必把科学的初步知識研究透彻。还没有充分領会前面的东西时，就决不动手搞往后的事情。”（“中国青年”，1952年，22期）老科学家以他的切身的体会告訴我們：科学知識是經過循序漸进而逐步掌握的。

在学学生学习上的这些特点，反映了人們認識的发展的規律性，因此，在学习方法上，凡离开这些特点的，也就是违背了人們認識的发展規律；这样的学习方法，其結果不是欲速則不达，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必須根据学校学习的特点，正确解决学习方法的問題。

正确認識集体学习的作用

整风运动以来，許多学生进一步認識了集体智慧是无穷的。許多学生自愿地組織了各种集体学习的形式。这比起过去普遍流行的个人閉門学习的方法，是一个大进步。集体学习的主要优点便是集中众人的智慧。

“三个臭皮匠，胜过諸葛亮。”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見聞总是有限的，如果集中了許多人的智慧，就可以使我們看得更周全。事实上，真正博学多能的学者，总是虛怀若谷，善于听取他人意見、特别是反面意見的人。

“武断”和“主观”是与科学不能并立的“冤家”。要有科学精神，就必须克服主观

和武断，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見。經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結論来。巴甫洛夫在柯杜什的自己的研究所中建立了所謂“星三”座談会制度，每逢星期三便在座談会上对各种观点、一周試驗中所得到的材料，包括巴甫洛夫本人得到的材料在內进行批判的分析。巴甫洛夫特別重視这种“星三”座談会，認為它是能够帮助发展科学、糾正所犯錯誤的一种手段。“星三”座談会就是一种集思广益的集体学习的形式，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方法。

但是，一切正确的东西，如果夸大到过分的程度，把它看得太绝对化了，那也就变成錯誤的了。列宁說得很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錯誤。”（“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第85頁），关于集体学习方法問題，也应该遵循列宁这一指示，有些同志看問題过于机械，認為好的就好到极点。不辯証地看問題，把集体学习方法绝对化为唯一的学习方法，这是錯誤的。

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說是更能集思广益，更能發揮大家的智慧。但是，集体学习只有在个人認真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很好的發揮作用，否則就不能收到集体学习的真正效果。因此，集体学习必須做得适当。青年学生听了教师講課之后，必須先有一个酝酿、复习、消化、吸收的过程，然后，才能在学习书本知識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知識。这一切都需要時間，都要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工夫。因此，学生應該有一定的時間自修。如果过分地提倡集体学习，把个人自修的时间也几乎挤掉，其結果，必然使集体学习的质量下降。个人自学与集体学习应占多少比例，要根据各年級的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总的一条原則必須遵循：以个人学习为主，在个人認真学习的基础上，适当地組織必要的集体学

习。

同时，集体学习不应妨碍个人进修和个人特长的发展，而要成为个人学习和发挥个人特长的助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著名的老战友，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互相促进的。他们几乎是从不间断地互相通讯，交换各种意见。这也是一种集体学习的方式。但是，这种集体学习一点也没有限制他们两人的特长和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研究共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之外，马克思却对数学很感兴趣，他的数学论文到现在也还有科学价值。恩格斯对军事学造诣很深，奠定了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他们并没有因为集体学习而影响他们自己的个人学习；相反的，集体学习，使他们在自学上得到更大的启发和指引。

什么是学习上的轰轰烈烈

有些同志认为学校学习生活过于恬静，过于“冷冷清清”。他们为了要“轰轰烈烈”，主张大力开展集体学习中的评比竞赛。在学校大闹评比竞赛的做法，实际上是忽视学校学习的特点。我们知道，工农业生产是一种物质生产的劳动，人们根据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算出人们在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所以，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开展评比竞赛，有它科学的客观的标准。但是，学习却是脑力劳动的过程，学习的好坏和理解程度不能用简单的算法来衡量。考试，也只是大体上反映学生学习的好坏，不可能有精确的计算。因此，在学习上开展评比竞赛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是违反脑力劳动的基本规律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是反科学的，因为它不能促使学生真正牢固地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并且在学校学习中开展集体评比竞赛，还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例如成绩好的学生埋怨成绩差的学生，说他们是“害群之马”，影响班或组的成績，而基础差的学生，则因此而影响学习情绪和信心；

或者埋怨教师教得不好，引起师生之间的矛盾等等。

那末，什么是学校学习上的“轰轰烈烈”呢？那就是认真地正确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师认真地系统地把文化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积极劳动，勤勉学习，循序渐进，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凡是能够这样的，就是轰轰烈烈，就是教育事业上的大跃进。反之，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学生却没有牢固地掌握知识。即使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在实际上却是真正的“冷冷清清”。

必须承认学习上的差异性

为什么有人会热中于在集体学习中开展评比竞赛运动呢？除了不明确学校学习的基本特点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忽视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学生在学习中由于下列原因是存在差异性的：第一，学生的政治热情、学习热情不同。有些学生学习的态度端正，能勤奋地为祖国而学习，学习效果也就比较高；反之，学习效果也就较低。第二，学生的学识修养的基础不同。有些学生因为在低年級没有打好基础，结果使他们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时，便产生了学习上的困难。第三，学生的天资不同。我们承认学生的天资是有高低不同的。这是因为后天教育的不同，个人勤奋程度不同，使学生的智力发展发生差异。这是客观存在。无视存在学生中的这种差异性，也是在学生的学习方法上采取脱离实际的做法的认识根源之一。必须承认和理解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才能采取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措施，有效地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学习。

真正的教育家并不是否认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并不否认学生接受水平有高低的不同、领会问题的能力有快慢之分。真正的

教育家是唯物主义者，他必先承认客观事实，承认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承认学生智力高低有所不同，接受程度也有差别，然后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材施教，掌握其规律，使学生真正学习得扎扎实实。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对学生便是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他对学生的性格、才能和志趣，都有极深的了解，在进行教学中总是根据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版，第793页。）平衡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达到了一个平衡之后，立刻又出现新的不平衡，以致于无穷。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也是如此。一班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当一个成绩差的学

生赶上全班学生之后，出现了暂时的平衡，但是立刻全班又会出现学习上的新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工作应该适应这种不平衡性，不断采用具体有效的措施，克服学生中新的学习的差异性，如果企图把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性人为地拉平，使大家“齐步走”，走在前头的要“原地踏步”，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做法。其结果只能使教育事业静止下来，使永无止境的教育工作停滞不前。既然“……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版，第773页）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会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冰窖之中。正因为学校学习本身有它的特点，同时在学生中存在着学习的差异，因此，一切教学方法的实施，都要从这些实际出发，而以能否提高教学质量为依据。没有经过多方研究和试行有效的教学方法，实行时必须慎重，不要轻率提倡推行。

广东心理学界联系实际写成一批论文

广东省教育学科教师学习会心理学习班学员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心理学的“超阶级”、“生物学化”和脱离政治等观点之后，努力贯彻心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分别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最近共写出了二十七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初步为心理学理论联系实际摸索到一条道路，并且为编写新的心理学教材提供了实际材料。

这批研究报告和论文的特色，在于以深入的实际调查为基础，选题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如心理学学习班学习工作组的同志在进行关于少年心理品质的形成及其培养途径问题的研究时，就深入江门市第一中学选择了一个班，并且担任副班主任，通过劳动、听课、团队班级活动，来了解学生品质表现。又举行了座谈会，查阅有关资料，还特别在班中选择三个学生作专门的调查了解和分析。在这样的点面结合地作了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写出了“试谈少年心理品质的形成及其培养途径”的报告。该会到农村、工厂、部队去调查的其他工作组，也就“农民的共产主义风格及其形成的条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等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的重大课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成了论文多篇。

该会拟把上述报告和论文，选出一部分送报刊发表，以供各地心理学教师和研究者参考。

观察形势，当机立断

万发云

一个革命工作者，不但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而且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方法不对头，好事就可能办成坏事，胜利也可能变成失败。所以，必须要重视工作方法问题。

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运用和提倡的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什么叫形势？形势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着的、复杂的社会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它的发展趋势。在革命工作中，不了解客观形势，就无从制订出指导革命行动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客观形势是第一性的东西。要使我们的主观行动符合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要使我们所制订出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正确，以达到胜利地完成革命任务的目的，就要善于对客观形势进行周密的观察和分析。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向来非常重视对革命形势的观察。每当国内外情况有重大变化时，毛泽东同志都是一再对形势的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与分析，并且都根据观察与分析形势的结果，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或措施，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对于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善于不断地进行观察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所谓善于观察形势，就是要正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的分析客观社会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它们的发展变化情况。既要观察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也要观察不利于革命的形势；既要观察“我方”的形势，也要观察

“敌方”的形势；既要观察国内形势，也要观察国外形势；既要观察一事物本身的发展趋势，也要观察和这件事物相联系的其他事物的影响；既要观察过去和现在的形势，也要观察将来可能发展的前途；既要看到形势的主流，也要看到形势的支流；既要看到事物的现象，又要看到事物的本质。对形势观察得越全面、越细致、越深入、越周密，制订出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会越符合客观实际，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从而也就能正确的指导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实践。

在革命工作中，不愿意观察和分析形势的人，一般表现为官僚主义，而不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的人，则一般表现为主观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须对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变化发展的情况，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必须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向，使工作更加有预见、有目的、有计划。

由于不同事物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因此，客观形势的范围也有大有小。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一个地区的形势，有工业生产上的形势、农业生产上的形势，也有经济战线上的形势和文教战线上的形势，在各个具体的工作上，也还有各个具体工作中的形势。同时，大范围内的形势，往往决定或影响小范围内的形势。任何一个革命干部，都要学会善于观察掌握国际和国内形势和本身工作中的形势。只有全面认清了客观形势，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以及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任

認清了形勢，就要抓住最恰當的時機，立即做出決斷，並付諸行動。

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情和能夠做什麼事情，不是由主觀願望來決定的，而是根據客觀形勢的需要和可能來決定的。超越客觀形勢所許可的範圍，跑得太快，在辦事情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之前，就輕易的行動起來，那會使事情因為沒有可靠的依據而遭到失敗或者碰到種種困難；而當該辦的事情的時機已經成熟，可是不立即去辦，過後才行動，錯過了時機，同樣也會因為形勢已經起了變化，原定的行動計劃、措施不符合客觀情況而使事情辦得不好或者失敗。時機還沒有成熟就輕易行動，或錯過了時機才去辦事，這都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方法不相容的。犯前一種錯誤的同志，其表現形式往往是“左”傾冒險主義。而犯後一種錯誤的同志，其表現的形式則往往是右傾機會主義。

抓住時機，不在時機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去干，也不等到錯過了時機才去干，這就是“當機”。在最恰當的時機，不過早也不過遲，立即作出決定，以便付諸行動，這就是“當機立斷”。當機立斷，就能保證革命工作的勝利和取得更大的勝利。“當機”就要“立斷”，換句話說，時機成熟，就要馬上訂出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行動計劃，以便使之實現。否則，就算你能够善于觀察形勢，看准時機，如果猶疑不決，也會錯過時機。

要當機立斷，就要善于觀察形勢。對形勢的周密觀察，是當機立斷的根據和前提。而觀察形勢，也正是為了我們能更好地當機立斷。有些人在工作中所以犯主觀主義的錯誤，把工作搞壞，或者前怕龍、後怕虎，老是憂慮無窮，束手束腳，這在方法論上的主要原因之一，都是由於他們對客觀形勢沒有作深刻而周密的觀察與分析，行動不符合客觀情況，或者對客觀情況了解不深，沒有把握，沒有信心，不能決斷。

當然，正如唯物辯證法所告訴我們的那

樣，由於客觀形勢是非常錯綜複雜和變化多端的，而人的認識，總是很難每一次都對這錯綜複雜與變化多端的客觀事物，反映得那麼正確與全面，也不容易一次就觀察得那麼深入與具體。因此，對於形勢，不但在“立斷”以前要進行周密的細致的觀察，而且在“立斷”之後也還要繼續不斷地進行觀察，看看我們的判斷和所訂出來的方針、政策、措施，是否符合客觀形勢的發展。如果經過新的觀察，並在實踐中發現了由於我們以前的觀察不正確，或者由於客觀形勢本身發生了變化，原來的判斷和所訂的方針、政策、措施不完全符合客觀情況的，那就必須對它們加以修改或補充，使之更加完善。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又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主要標準，檢驗判斷是否正確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實踐。在通常的情況下，某些方針、政策、措施，所以要用“草案”或“暫行辦法”的形式出現，正是便於在“試行”的實踐過程中，來檢驗它們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情況。以須在發現了問題，或者由於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提出“修正案”或“補充決議”，使原來的決定更加完善、更加正確、更加符合實際。

根據對客觀形勢觀察的結果，當機立斷，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不斷地對客觀事物、客觀形勢進行觀察，並根據新的觀察、研究所發現的新的問題、新的情況，進行一次再次的判斷，也同樣十分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第二次第三次的“立斷”對初次的判斷起了檢驗、修正和補充的作用，使判斷更加正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實際。

有的同志，雖然也能够當機立斷，但在初次“立斷”以後，就以為萬事大吉，不再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不再檢查和了解原來的判斷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情況，效果如何，這是十分危險的。又有的同志雖然也看到了新的形勢、新的變化，但他們不是根據新的客觀形勢，來修改、補充自己初次的

“立断”，而是埋怨形势发展得太快或太慢，或者埋怨群众、埋怨上级领导。甚至有少数的同志，明知自己的初次“立断”有了错误，还不设法修改、补充。上述所有犯错误的人，除了给革命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以外，当然不会有别的结果。

要做到善于观察形势和当机立断，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是走群众路线，一个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要对客观形势有正确的观察分析，决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孤陋寡闻可以办得到的。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干部中、特别是基层干部中去，依靠群众，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清客观形势。

不仅在观察事物、观察形势的时候，要走群众路线，当机立断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当机立断并不等于个人孤断、独断，而是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并作出决断。

走群众路线并不排斥重视少数人的意见。革命工作者，不仅要虚心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很好的考虑少数人和个人的意见。不仅要听取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取反面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

意见，而反面的意见则可以促使我们更全面的考虑问题，防止主观片面。总之，兼听则明，只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加以分析比较，发现多方面的问题，才能对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除了走群众路线以外，一个人能否善于观察形势和当机立断，跟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人，就是整天生活在群众中间，对客观形势、客观事物的观察也是很难全面和完全正确的，从而也就很难抓准时机、正确决断。在合作化运动中，那些高叫要快点下马的某些干部虽然整天生活在农民群众中间，为什么他们对合作化运动形势的估计，和毛泽东同志的观察与分析完全两样？去年冬天以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平均主义倾向，为什么不是由在农村工作的干部首先发现，而是由毛泽东同志首先发现呢？这就说明，一个人能否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跟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走群众路线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善于观察形势和能够当机立断的基本方法。

广东师院讨论何正关于价值规律的错误论点

广东师范学院政史系与马列主义教研室部分教师，在系党支部书记范朴同志主持下，于5月8日、14日，就本刊发表的有关批评该院政史系教师何正同志在广州经济学界座谈会上发言的文章，作理论上的探讨。最初，何正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论点，经过到会的教师如李永协、李增岳和吴秉仁等同志的反复辩论，并且指出何正同志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对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以及这两个规律的相互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最后，何正同志初步承认自己对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他仍然保留自己的某些论点，并且还认为在“理论与实践”第四期上发表的郑芝村和何梦弃两位同志的文章，在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庸俗学派的观点。广东师范学院学报也发表了该校教师批判何正同志的错误论点的文章。（广东师院陈华新）

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

——对“苏轼试论”与“几点意见”的意见

艾治平

前年冬天，讀到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文学研究”第四期），就觉得有些观点是頗值得研究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的“文学研究”上，又讀到了关于这一問題的討論：一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級黃昌前同志写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一篇是王季思先生的答复文章“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問題”。根据这些文章的观点，我想談談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黃昌前同志的“几点意见”中提出来的三个問題的基本精神，①我大抵是同意的。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如何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这一点上，我觉得黃昌前同志的論述，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

“几点意见”开头就給人这样一种印象：新党是进步的，旧党是反动的，苏轼站在旧党这一边，反对新党，因此是反动的。黃昌前同志說：“实际上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向旧党呈书献策。这种态度是非常反动的。苏轼的作品也表现了这种反动的态度，这是勿用怀疑的。”当然，不能同意王季思先生这样的看法：苏轼好象完全是一个不偏不倚、站在中立地位为人民仗义执言的人，以及把苏轼本来是从巩固統治集团、調节内部矛盾出发，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說成是什么“制科人习气”或“比較持平的态度”，等等。这是不妥当的，片面的。可是

我也觉得：黃昌前同志虽然糾正了王季思先生看法上的片面性，但却又从这个片面，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的这种各走极端的評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毛主席在批判那种形式主义地看問題的方法时指出：“……他們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就是絕对的好，一切皆好。”用这种方法来評價特定的历史人物，当然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結論。

无庸諱言：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目的是想在不增加人民負担、不加重社会危机的前提下，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包括高利貸者）的一些利益，并使他們分担一些賦稅，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强国防的力量，抵御辽夏的侵扰”。②这种从“理财、整軍、富国、强兵”各个方面多管齐下的作法，当时的确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績，給人民——更正确地說是給中、小地主，带来了一些好处。所以在历史上它是一次进步的政治运动，而以司馬光为首的持反对态度的旧党，則是保守和反动的。但能不能以此說站在旧党一边、反对

①“几点意见”中提出的三个問題是：“制科人习气”和“持平的政治态度”；苏轼作品的“乐观精神”；豪放派領袖。

②见尚絨主編的“中国历史綱要”。

新法某些措施的苏轼，“政治态度”便是反动的呢？我看还需要作具体的研究。特别是：不能片面地从这一点出发，去评价苏轼的思想和文学作品。

新法的内容主要分为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而作为这两个方面内容之一的限制官僚地主特权和加强国防，苏轼是赞成的——并且身体力行，在定州任内，就曾整飭军纪，巩固了国防。他反对新法，并且是和他怕新法推行过猛，不利于民这样一种认识分不开的。

更重要的是，检验一个作家的最基本的尺度，要看他对人民采取的是什么态度。我们知道：苏轼在各地作地方官任上，的确作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在凤翔签判任内，他曾努力去改善“民贫而役重”的情况。在开封，取消了元宵节家家张灯的命令。在徐州时，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他亲临抢救。在杭州，为遭大旱和飢疫的人民请求免交贡米，疏浚西湖，兴修水利……。他在每个地方都给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然而由于黄昌前同志忽视了这些事实；又不从苏轼全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去作全面的探讨；只片面地从他反对新法这一点——也没有区别他和其他旧党态度的不同——来评价，便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非常反动”，从而得出了“由于苏轼的反动的政治态度，他的落后的世界观，所以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一般说是不很高，好的作品也不多”的片面结论来。

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允的。我们姑且不论苏轼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多么大的贡献，单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看，也不能说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一般说是不很高，好的作品也不多”的。就以黄昌前同志提出的“荔枝叹”来说吧。我觉得它并不仅仅如黄昌前同志说的那样：“讽刺了进佳果名花”；它比这有着丰富得多、强烈得多的政治内容、社会内容。这首诗的现实意义决不仅仅在于

斥了唐明皇杨贵妃等的荒淫奢侈生活，“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深切痛恨；也不仅仅在于苏轼同情人民疾苦的心肠：“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飢寒为上瑞”；它的丰富的、强烈的政治社会内容在于：“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国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憐亦进姚黄花。”苏轼屡遭贬谪，唯一原因是：“平生文字为吾累”。①但现在，苏轼仍指名道姓地痛骂当时这些大官僚们殃民的实情，暴露出社会的黑暗，这难道是“讽刺”一语能够包容得下的么！

而且，这种大胆揭露统治集团罪恶，对人民寄予同情，对恶官直言痛骂的诗，从“量”来说，也不是“不多”的。比如有的写：农民在雨灾虐政下呻吟，“卖牛纳稅拆屋炊”，仍难以为生，因此想自杀“不如去作河伯妇”；②有的写人民辗转悲苦的情景：“人如鸭与猪，投泥相见惊”；③写贫富生活悬殊的有：“富人事华靡，綵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擎出春磨”；④写人民遭受盘剥的有：“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⑤……等等。当看到“老农释耒叹，泪入飢肠痛”时，他不愿提起自己行役的劳苦。⑥“生平所慚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⑦——被统治阶级看成天经地义的审判、鞭打人民，他却感觉惭愧羞辱，深为不安。不用再举引了，就从这几首诗来

①苏轼诗：“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使”。

②苏轼诗：“吴中田妇叹”。

③苏轼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④苏轼诗：“饋岁”。

⑤苏轼诗：“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

⑥苏轼诗：“除夜大雪留濰州。天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

⑦苏轼诗：“戍子由”。

看，能說它沒有較有力地揭示出統治集團的驕奢，政治的黑暗，官吏的暴虐，人民的痛苦么？能說它不是在流露着作者的深厚同情么？所有這些，便是蘇軾對人民所採取的態度！

在對蘇軾作了以上應有的肯定後，當然我們也應看到：他對人民更多的是出於憐憫的同情，還沒有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也無意對那吞噬人的政治制度，作根本的改革；象“太公治齊，周公治魯”那樣，^①就是他理想的“藍圖”了。這些，是蘇軾的短處，也是歷史的局限。但在八百多年前的宋王朝，象蘇軾這樣比較開明、正直，對人民的苦難抱憤懣和同情的官，在作品中較真實的反映着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作家，並不多；有這樣的官，這樣的作家，不是難能可貴的嗎？象王季思先生那樣缺乏階級觀點的分析，全盤肯定，固然是片面的；然而，如果不全面地和歷史地評價歷史人物的活動，只根據蘇軾屬於舊黨，反對新法，就給戴上一頂政治態度“非常反動”的帽子，並進一步認為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不很高”，“好作品不多”，恐怕也是失之於偏頗的吧。

（二）

蘇軾的作品里有沒有“樂觀精神”呢？王季思先生說：有，並作了不少的闡述。他說：“詩人在這些作品^②里流露的樂觀精神，不但集中表現了我國人民對於和平生活的熱愛，同時給作者一種‘觸處生春’的感覺，培養人們對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嚮往與關心”。又說：“他（指蘇軾——筆者）依然能夠從苦悶里擺脫出來，揭示生活中美好的、壯麗的一面，如‘瓊樓玉宇’的清景，‘千里共嬋娟’的願望，祖國江山的雄偉，英雄事業的輝煌等等，鼓舞了人們面向生活前進”。總之，王季思先生認為：蘇軾作品里不僅有——而且這種“樂觀精神”還“鼓舞了人們”，成為向生活前進的力量。黃昌前同志說沒有，並列舉了一些詩句作証。他說：

“遺憾的是我們從他（指蘇軾——筆者）的作品里得出了相反的感覺。”

從上面一部分引語里可以看出：王季思先生對蘇軾的“樂觀精神”給予了多么高的評價，認為許多詩篇之所以獲得成就，正是由於作品里面具有“觸處生春”的“樂觀精神”的緣故。而黃昌前同志之所以認為蘇軾“好的作品不多”，主要又是覺得詠花、飲酒、閑遊之作里面，充滿了消極悲觀的思想感情。從這裡可以看出：王、黃兩位是以“樂觀精神”之有無作為主要准繩，來衡量蘇軾的作品了。這，我覺得都是不妥當的。

蘇軾是一個有着多方面成就的作家，詩、文、書、畫，都搞得不錯。通過他的作品，我們看到了祖國山河的壯美，看到了他孤傲的氣質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他的作品是具有一定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我們不能同意王季思先生關於蘇軾“樂觀精神”的那些基本論點，特別是把帶有頹廢成分的“念奴嬌”，也竟說成什麼“鼓舞了人們向生活前進。這是構成了他的詞的豪放風格的基本的一面”之類的看法。在蘇軾的代表作“念奴嬌”里，作者的確用自己雄健的筆，熱情地贊頌了祖國的壯美山河——赤壁形勝，熱情地、不無感慨地歌頌了那過往的英雄人物——未得東風之便的“周郎”。這時，蘇軾被謫黃州已經兩年多，悲憤的心情和他那曠達的胸懷緊緊地交揉在一起；調子是沉郁的。而到最後，“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頹廢消沉的情緒，便溢於言表了。

“水調歌頭”是一首寫得不壞的詞。“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包容着詩人對美好生活熱切的憧憬和追求。這些是蘇軾作品的偉大成功之處。然而，“人有悲歡离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

^①蘇軾：“思治論”。

^②指蘇軾的“南園”、“初到黃州”、“游博羅香積寺”諸詩。

古难全。”这，又是苏轼思想局限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判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象王季思先生那样“一切皆好”的态度，固然是片面的，对读者没有好处；但象黄昌前同志由于认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高处不胜寒”等，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而把它们称为“消极颓废的诗篇”，未免也失之偏颇了。

苏轼某些作品里面，流露着颓废消极的情绪，这是和他从庄子、陶渊明那儿接受来的隐逸出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有密切关联的（如黄昌前同志文章举的那些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以及“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①“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②等等。）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苏轼的作品里有没有豪放、旷达、乐观精神呢？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这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以为它的基调属于这个方面，而不能因为有两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把整首词放到“消极颓废的诗篇”那一方面去。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轼的乐观、旷达是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性质，与人民的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自然是有所区别的。

（三）

苏轼，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贡献。在词的方面，更成为词坛一个新天地的开拓者，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的确，词到苏轼起了很大的转变和进展。“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多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③他在词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扩大了词的领域，使词的意境逐渐深远明阔起来。以前的词，绝多局限在男女恋情、伤别怀远等狭小的圈子里。苏轼的词虽

也有描述悲欢离合的，但举凡吊古、感旧、纪游、谈禅、悼亡、送别……各式各样的事物，却都无不入词了。

正是这种“野马横空”的革新精神，苏轼打破了所谓的“诗庄词媚”的传统界线。而以诗为词的手法，形成了他独有的诗化的词风。当时虽然引起过某些人的不满，但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句读不茸之诗”，把词从原来的小天地“解放”出来了。也正是由于这样，词向前大大的推进一步，逐渐走上较健康、宽阔的道路，从而给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等，以有益的影响。

然而黄昌前同志完全无视这些事实，在“几点意见”最后一节里，除了反复强调说：“他（指苏轼——笔者）很多作品思想性是不高的”，“他的作品里很少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之外，并且连苏轼三首“浣溪沙”所描写的农村欢乐景象，也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当时是否真有这种‘农村欢乐的场景’……我们也知道封建社会里农民只有苦笑泪眼。”我觉得这种认识是很奇怪的。当然谁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是悲苦的，可是在农村长大的人我想大概还都记得：“苦笑泪眼”绝不是农民的生活全部。他们是具有着乐观精神的，节日、社日，甚至在平常日子里，他们往往还要打扮起来，敲起锣鼓，乐一阵子的！怎么说农村一年到头就不会有这种“欢乐场景”呢？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对苏轼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深远影响的作家，我们特别需要全面地严肃地来进行评价；并且由于他复杂的人生观，反映到作品上的思想感情也较复杂。因此任何简单化的作法，都要走到这样的片面或那样的片面去，而不能得到科学的、较准确的结果。

①苏轼词：“雨乡子”。

②苏轼词：“临江仙”。

③见汲古阁本“向子諲酒边词序”。

應該如何評價曹操

戴裔煊

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把他的思想行動跟當時當地的情況、人民大眾的願望和要求聯繫起來，從內部聯繫作出具體的分析。不能離開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割斷事物的聯繫，凭空孤立地就事論事，這就是歷史觀點。具有這種觀點，才有可能對某一時代的歷史人物作出正確的評價。

曹操的思想行動受到當時社會客觀存在的影響，反過來，他對當時的社會存在，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們要把他放在當時整個社會圖景中來看，看他所處的是什麼社會發展階段，當時當地的情況怎樣，人民大眾的願望和要求怎樣，他的思想、行動和一切措施是不是合乎人民大眾的願望和要求。把這些方面聯繫起來看，才能夠看出他的思想、行動和一切措施的真正意義。

其次，要注意當時社會發展的動向。我們評價歷史人物，要看他的思想行動和一切措施跟發展中的社會動向是否相合，對當時社會發展起促進的作用還是起促退的作用。同是一種制度或措施，當它和發展中的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相適應，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促進的作用時，它是進步的或革命的；當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延緩或阻礙的作用時，它就變成落后的或反動的。因此，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在認清社會性質的同時，還要注意當時那種社會是在上升期還是沒落期；他所推行的制度或措施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同是一種制度或措施，由於它在不同時期所起的作用不同，我們對它應有不同的評價。

又其次，我們評價歷史人物，要注意階級分析。在階級社會里，由於人們在一定的

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個人的思想行動也就代表着其所屬的階級。同一個階級，如果屬於不同的階層，彼此也有差異。因此，評價歷史人物，必須進行階級分析，看他屬於那一個階級和階層。

最後，我們評價歷史人物，要結合當時的情況，分析階級矛盾。階級分析的目的，在於抓住主要階級矛盾。因此，我們要看當時那些階級矛盾是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不同。如果不抓住主要矛盾，或者誤認次要矛盾為主要矛盾，也不可能對歷史人物作出正確的評價。

按照這些原則，我們對曹操這樣歷史人物應該怎樣評價呢？

東漢後半期的社會是在奴隸社會崩潰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當時由於大官僚地主貴族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壓迫和奴役，兼併農民的土地，加以水利失修，連年災荒，結果使農民破產，被迫離鄉去里，流離轉徙。人們在死亡綫上掙扎，常常出現人食人的悲慘景象。另一方面，以劉漢皇帝為首的腐朽統治階級則窮極奢侈，大興土木，廣置田宅。政治腐敗到达了極點，階級矛盾到达了極其尖銳的地步。“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當公元二世紀中葉，農民、奴隸、手工業者以及其他的社会下层人物掀起了廣泛的起義。起義範圍之廣，東至青徐，西至涼益，南迄交州，北抵幽冀。起義者除了漢民族以外，還有少數民族，里面包括有武陵蠻、長沙蠻、零陵蠻、板楯蠻、烏滸蠻、益州夷等等。到公元184年黃巾軍的起義，聲勢浩大，起義者絕大多數都是無家可

归、带着家人妻子、流离失所的难民。他們没有什么武装，更談不上什么組織和訓練。他們响应黃巾領袖张角的号召，揭竿而起。他們并不反对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他們反对豪門貴族地主凭借地方势力造成割据混战局面。他們要求統一。有一个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权，有利于統一，也有利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所以自汉桓帝即位以来，不少起义农民的領袖，自称“皇帝”、“黃帝子”、“太初皇帝”、“太上皇”、“阳明皇帝”等称号。张角到处宣传“蒼天已死，黃天当立”，也表示他要做皇帝。曹丕称帝，以“黃初”为年号，就是企图利用人民大众的愿望，表示他为真命天子。以达成他的統治。由于資料不足，我們虽然未曾发见当时起义者有提出平均土地或重分土地的口号，他們渴望得到土地，則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曹操是地主階級的人物。从一般來說，地主階級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有着根本上的矛盾，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这种矛盾，表现出他与黃巾軍首領的对立。但这只是問題的一个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以刘汉皇帝为首的大官僚大地主豪門貴族統治集团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奴隶，以至于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曹操所代表的是中小地主，而一般中小地主与农民之間的矛盾，在当时居于次要的地位。

由于曹操所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由于中小地主与豪門貴族大地主之間存在着矛盾，曹操反对豪門貴族大地主任意压榨农民，兼并农民的土地，反对他們要农民代出租賦，使农民破产。他認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他要求做到均与安，主张輕徭薄賦，減輕农民負担，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过日子。

曹操企图实现統一，結束地主武装割据的混战局面，与农民渴望統一的要求一致。

曹操在济南毀坏神坛，黃巾軍首領的檄

书認為他的做法与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

这些表明了地主階級的曹操与农民有其共同之处。

我們必須肯定曹操与农民之間有矛盾，在肯定这种矛盾的同时，我們还必须注意曹操与农民之間这些共同之处。有矛盾才造成曹操对黃巾軍首領的打击；有这些共同的地方，也使黃巾軍在失敗以后接受曹操改編和服从他的領導提供前提条件。在当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大官僚地主豪門貴族集团，曹操与黃巾軍之間的那种中小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并未造成妨碍彼此合作的严重障碍。因此，黃巾軍在济北被曹操击败以后，三十万战士和親屬男女老幼百多万人向曹操投降，那許多精壯的黃巾軍并愿意接受曹操改編为“青州兵”。我們必須指出：当时的形势，黃巾軍杰出的領袖张角早就死了，张梁张宝也相繼被害，各地黃巾軍的余众虽然在地方首領的领导下，孤軍奋战，此仆彼起，但由于缺乏統一的領導，而又到处受到官軍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他們的領袖不可能領導他們实现他們的目的和要求，因此，他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为結束混战局面、实现統一、过安定的生活而奋斗。

有人認為黃巾軍接受曹操改編为青州兵是出于曹操誘降和强迫改編，这是沒有根据的。兩軍对壘，一方被击败，假使不是愿意投降和接受改編，那有不四散奔逃？怎会百多万人在一起听候編遣？揆之常理，已經不合。史实也証明了这种說法的錯誤。黃巾軍自从193年1月（汉献帝初平三年十二月）接受曹操改編为青州兵，至220年2月（即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当时未改元，曹操卒后改“延康”，十月曹丕称帝改称“黃初”元年）曹操死时，青州兵在曹操领导下轉战南北，足足27年。到曹操死后，他們见到情况不对头，才击鼓相引去。当时有人企图用武力制止，賈逵还認為这种办法行不通，結果

由他草拟一篇长檄，要各地于青州兵到来时，供给青州兵廩食。足証誘降强迫的說法，完全缺乏史实根据。

对曹操评价的好坏，有许多人把目光集注在曹操打击黄巾軍这个问题上。认为曹操坏的，固然把这一件事提高到首恶的地位，即使认为曹操好的，也把这件事作为他的缺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首先打击黄巾軍的并不是曹操，而是大官僚大地主統治集团的一班劊子手皇甫嵩、卢植、朱儁等。杀害了黄巾軍杰出的領袖們的就是皇甫嵩。黄巾軍的首領遇害以后，群龙无首，各地黄巾軍的余众到处遭受到汉皇朝的官吏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不特他們的目的要求无法实现，而且变成了走投无路。曹操虽然打击过黄巾軍，但并不是把黄巾軍消灭了，而是把他們改編过来，对男女老幼青壮年分别予以适当的安置。当黄巾軍到处都遭受到反动統治階級剿杀的时候，曹操这种措施，使男女老幼青壮年各得其所，有什么不好？史实証明：黄巾軍改編为青州兵以后，在曹操的领导下，保持着完整的队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曹操沒有以地主階級的意志，限制他們的行动。他們在曹操领导下，仍时常予地主富豪以打击。曾試过有这样一回事：青州兵击伤了十多个地主富豪坏傢伙，大抵也剥夺了他們的来自不义的財物，从前曾杀害黄巾軍首領的地主階級分子于禁，听信那些坏傢伙一面之詞，罵青州兵为“賊”，激恼了青州兵，向曹操控訴于禁，于禁也向曹操辯訴，曹操只嘉許于禁的战功，关于他和青州兵的糾紛，置之不問。青州兵追随曹操那么长久，这也是一个說明。曹操这样对待青州兵，又有什么不好？

也有人认为曹操是战争的发动者，所发动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且在战争中也杀过不少人，把曹操說成了一个好战好杀的魔王。我的看法也不是这样。須首先声

明：我反对战争，也不主张杀人。但我认为：东汉后期的战争究竟是誰发动的，曹操是不是战争的发动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参与的战争究竟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对于这些问题未研究清楚，马上就下論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說，战争是某一階級的政策通过暴力手段的繼續。这种基本原理，对于說明东汉后期的战争，同样适用。我們不能把战争跟当时的階級矛盾割裂开来，同时我們也要把东汉后期的战争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把每个战役和它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整体割裂开来，这样才能够了解当时战争的本质。东汉后期的战争显然是大官僚地主豪門貴族統治集团发动的。当他們使用各种手段都不能达到他們的階級統治目的、不能阻挠广大的农民和奴隶起义的时候，他們就动員一切地主階級武装力量，采取公开的暴力镇压方式，东汉后期的战争就是这样引起的。在镇压黄巾軍起义以后，大官僚地主官官等統治階級之間內部的矛盾斗争，又演成彼此混战局面。統治階級这样发动的战争当然是非正义的。在这一过程中，曹操是战争的参与者，而不是战争的发动者。关于这一点，我們必須有明确的認識。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已瀕于絕境，官僚地主武装割据，連年混战，給人民带来了更大的无止境的灾难，曹操与青州兵一道，为結束割据混战局面、实现統一而战，为保卫祖国和人民、把他們从异族侵略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战，我們就不能說是非正义的。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不在于杀人和不杀人，从来的战争沒有不杀人的，不杀人的战争也就不能成为战争。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要看战争是不是为社会向前发展服务。正义性的战争是为社会向前发展服务的，于人民大众有利的。曹操与青州兵一道，为結束大官僚地主的武力割据，实现国家統一，让人民在新的生产关系之下，发展生产，安居乐业过生活，消灭流离失所人食

人的悲惨景象，保卫他们，使不受异族奴役，为这些而战，或者以战止战以达成这样的后果，怎能说是非正义的。

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现象本身有它的阶级矛盾的根源，如果我们不从阶级矛盾进行分析，便不可能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我认为评价曹操，不应从非本质的东西着眼，最重要是在于看他的措施是不是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是不是对人民大众有利。从这种关键性的问题来看，曹操是无可非议的。

首先是其所推行的屯田制。屯田制始于曹操。汉武帝开边，在西域早已推行。但是我们不能迷惑于表面现象，把西汉所推行的屯田制和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混淆起来。由于时间、地点与条件不同，同是屯田制，彼此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西汉时在西域所推行的屯田制，其主要目的在于巩固国防。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的意义，虽然一方面发展生产，增加军粮，使所在积谷，免除了河北袁绍的军人吃桑椹、江淮袁术统治下的人吃蒲羸甚至人食人的饥饿可怖现象，为实现统一、军事上走向胜利打下牢固的经济基础。但作为对曹操评价的根据，这还不是主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在于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体现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田客或田兵从官府得到土地；用官牛的，则官得收获物十分之六，用私牛的其收获物与官府平分。无论这种制度剥削的轻重，它使田客或田兵有一定的独立经济，比起奴隶占有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它是一种比较缓和的剥削方式。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它提高了生产者对生产的热情和兴趣，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社会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曹操用棗祗韓浩的建议，募民屯田，使破产流亡的农民和逃亡的或被解放出来的奴隶，有田可耕，生活有着落，这一过程是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一无所有的奴隶重新获得

生产资料的过程。对于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农民和奴隶流亡问题提出了有效的方案，同时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也架起了快捷的桥梁。

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和古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二世纪流行起来的隶农制正可互相比拟。彼此在发展的过程上，在制度和它所起的作用上都有其共同之处。从时间上来看，彼此也差不多。当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贵族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奴隶主的大庄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破产的农民变成了游民无产者，在乡村站不住，集中到城市里来。他们要求重分土地，于是引起一系列的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奴隶因为不能忍受奴隶主残酷的剥削压迫，也经常起来暴动。由于奴隶暴动、逃亡、和对生产不感兴趣，使奴隶主不特感觉到危险，而大庄园经济亦无利可图。所以罗马帝国初期，不得不采取小农经营方式。把大庄园分成小块地产，分别租给缴纳一定租金的世袭佃农，或租给分成制的农民，主要是租给隶农科洛尼（Colonus）。和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虽然在名称上不同，实质上是差不多的。从社会发展过程方面来看，它是代表着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它也是奴隶和农民起义所引起的结果。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亦即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奴隶和农民大起义以后，开始出现真正具有隶农含义的“科洛尼”这个名词。在中国也是黄巾大起义以后始兴屯田。阶级斗争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古今中外，其理一同。从制度方面来看，古罗马最初采用定额租金制，后来一般采用分成制。罗马的分成制，农民一年只能得劳动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九分之一，比之屯田制的四六分或对分制的剥削残酷得多。姑勿论剥削的轻重，采用分成的方式是中外所同。还有，隶农制和屯田制本身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倾向于把生产者固着

在土地上，不許离去。由于国家要求赋稅收入得到保証，或者由于生产者不能償付田租的残酷剝削，留下償还不清的余欠，結果生产者就被紧紧地束縛在土地上。到了公元四世紀，羅馬皇帝用法律规定，不許“科洛尼”离开土地。对于企图逃亡的“科洛尼”，可以象奴隶一样用鎖鏈鎖起来。別人也不許收容他。收容逃亡的“科洛尼”不但要送还原地，而且要償付他逃亡期間的人头稅。屯田制也是如此，参加屯田以后，也不許逃亡，逃亡則罪及妻子。恩格斯說“科洛尼”是中世紀农奴的先驅，屯田制度下的田客田兵不是同样性质的生产者嗎？

农奴制的剝削是残酷的，但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它是代表着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曹操当时所推行的屯田制也体

现着同样时期同样的生产关系，那么，曹操的措施是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促进作用呢？我們评价曹操，只要把握着这样的一个要点，已經有足够的力量說明問題了，何況还不止此。

最后，还要指出：当时三郡烏桓利用中国內乱，乘机破幽州，擄掠十余万户汉族人民为奴隶，他們与袁紹勾結，常常入塞为害。曹操击潰这种外族的侵略者，把汉族人民从他們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对于国家民族也有一定的贡献。

从这些方面看来，过去受封建社会正統主义观念支配的人們罵曹操奸伪，确实是冤枉他了。我們有足够的理由，替他翻案，恢复他的本来面貌。

广州学术界对曹操评价問題的討論逐渐深入

自今年四月份以来，广州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部門即組織有关曹操评价的討論，目前，討論已逐渐深入，由对曹操的评价进一步接触到东汉社会性质和黄巾起义的作用等問題。四月間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师生举行了两次座談会，就曹操的屯田与鋤豪强的历史作用、曹操在建安文学高潮中的作用等等广泛开展了討論，并在系刊“东风”上出版“曹操問題討論專輯”。中山大学历史系于五月間举行了两次关于曹操评价問題的討論会，該系教授戴裔煊应广东史学会、广州历史教学研究會及本刊編輯部的联合邀請，于五月二十二日在广东科学館作了“关于曹操评价的几个問題”的报告，这个学术报告在本刊这一期上发表。中山大学中文系也在五月二十二日討論了曹操問題，一致肯定了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并着重討論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問題。

六月八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組举行第三次关于曹操评价問題的討論会，对戴裔煊教授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为东汉后期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崩潰时期，而認为封建制度开始于西汉。由于封建制对奴隶制革命的不彻底，所以东汉仍有大量奴隶存在。曹操的作用并不是封建社会的过度，而是在于打击豪强，排除奴隶制残余，而有利于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些人認为屯田制在西汉就实行过。曹操实施屯田制不是代表新的要求，而是为了解决軍食問題，不能看作是封建时代确立的标志。

为了更进一步的展开对曹操评价問題的討論，广东史学会拟于六月及七月間举行三次学术討論会。第一次討論会暫定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負責中心发言，重点討論汉末社会性质和豪門大族的階級問題。

試論明代矿业中 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

李龙潜

一、明代矿业的发展

明代矿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采矿区域的扩大上。根据史书所载产矿的地方，可以明显看出明代比宋代、元代采矿区域扩大了，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矿了，連那些偏僻落后的深山穷谷，也有人在那里采矿，可见明代矿业发展的程度。

其次，矿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矿課上，因为从矿課中，可以窺出产量的增长。白寿彝先生根据明实录太祖朝、成祖朝及宣宗朝年終的矿課統計，汇列成一表，表中汇列了金銀銅鉄鉛諸課數目，認為“各卷实录所列岁計，都列金銀于采納項下，列銅鉄鉛等項于杂課項下。采納者，官矿所采；杂課者，民矿所出。但二者混言，也都称作課”。因此白先生把金銀課归为“官矿所采”，把銅鉄鉛归为“民矿所出”，从而說明明代矿业的发展趋势：官矿走向衰落，民矿走向发展。

我認为根据实录太祖朝、成祖朝及宣宗朝年終矿課統計，只能看出明代矿业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发展的，金課增加还不多，但銀課就增加得多了，这正如白先生的統計，宣德九年（1434年）的銀課是永宋元年（1403年）的四倍多，是洪武二十三年（1399年）的十一倍弱些。銅課和鉛課都有定額的象征，很难比較，但也可看出其有很大的潜力。至于鉄課，宣德九年是永宋元年的七倍多。由此可见明代矿业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发展的。

二、明代矿业的商品生产和国内外市场

明代矿业有官营及民营二种。民营的經營形式又分为二种：一种是政府批准，定稅后发給執照，才能采炼出售。如开采銀矿，“商民凿穴得（矿）砂，先呈官府驗办，然后定稅”。另一种是官督商办的，更确切來說是政府招商承办，是在官府管理，商民采办的形式下进行生产的。如万历年間江西稅監潘相在江西开石膏矿，就是立厂“招商承办”的。①政府愿意“立厂招商承办”，目的一方面惧怕民营

矿业对“矿工”控制不严而出乱子，因而派官管理監督，另一方面在“征收”稅課，“以裕国計”，搜求財富，企图控制商人經營矿业，但这种形式和民营的另一种形式一样，都是进行商品生产的。

民营矿业除交矿課外，一般都是进行商品生产的。广东潮州惠州等地出产的鉄，早在景泰年間，商人用牛運轉，日数千駄，經梅岭运到江西一带銷售，当时这一路运鉄为生的工人很多。②云南出产的銅錫，在本地銷售，每斤只三十文錢，而商人运往外省出售即“二三倍其值”，就是說每斤能卖六十文或九十文錢，因此商人使用工人肩挑或馬馱，不怕路程遙远，从云南出发，“經二十余站”，运往贵州鎮远等地出售，从中取利。③四川出产的銅，天启年間，“商人販銅者”从企业主收購，然后“以五分或四分赴該司上納，照时价估領价”外，“其余給票听从貨买銅斤”，这些“商人販銅者”經過荆州，直运到湖广一带銷售。④此外金属制成品，也以商品的姿态出现于市场上，如果是生产工具——农器之类，还得到政府免稅。⑤明末清初广东佛山出产的鉄鑊，也“鬻于江楚”之間。⑥云南永昌騰越等地的金銀銅鉄制成品，“皆精好甲他处”，“輻輳轉販不經而走四方”。⑦甚至出现了为牟取暴利而弄虚作假的企业主，史称：“山西鑄冶火盆盆之类，出炉乘紅刷以胆矾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⑧

由于商品經濟的发展，对外貿易日漸扩大，国

①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七。

②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七，江西四。

③ 明王士性：“黔志”〔丛书集成本〕頁四。

④ “熹宗实录”卷三五。

⑤ “太祖实录”卷三〇。

⑥ 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一四，一五，“貨語”。

⑦ 謝肇淛：“滇略”卷四：“風土志”。

⑧ 明衡郡文林撰：“瑯琊漫沙”頁八。

际市场需要金属制成品亦日益增长。如当时中国出产的铁锅，就用舟运至东洋沙璠及日本销售，运至日本的铁锅，每个售价一兩。日本所需的金银泊亦皆是武林造。^①嘉靖四十二年奥塔加栖阿（Carcia daqrta）在印度发表的論文指出：中国的銀床、銀器、銅汞、銀朱等物每年都有运至果阿（Coa）及可陈（Cochin）銷售。此外日本、琉球、菲律賓群島皆需要中国的铁器，售价亦很高。^②說明这些产品已經以商品的姿态进入了国际市场，并且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大大刺激了民营矿冶业的发展。

上述事例，証明在明代矿冶业中，进行商品生产的確是十分普遍和广泛的，而且有国内外的广大市场。矿业和人民的生計有密切关系，也和当时的社会經济分不开。由于进行商品生产，买賤卖貴，降低成本，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向工人剝削率，攫取高度利潤，因此出现了不少以經營矿冶和矿业起家的商人。如正德間，海阳人“詹安以铁冶起富。^③嘉靖間，歙州长里人，“那次公少服賈，以铁冶起家。^④吳中张銅的銅，“与銅名起家，而其人且与縉紳先生列座抗礼焉”。^⑤这不仅說明民营矿业有利可图，日益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也說明了这些企业主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政治、經济地位。

明代矿冶业的商品生产，必然引起二个效果：第一，資本的积累，刺激民营矿业发展。这从上述商人从事矿冶业經營致富起家，及广东商人經營每一炉场要投下“万金”的資本得到証明；^⑥第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列宁指出“正是这个商品經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階級（陷于破产变成雇农）和資产階級（吸血鬼）即变成資本主义經济。”^⑦事实正是这样，在明代矿业活动中，这种分化已經萌芽，出现了两种人——企业主或包买商和“矿徒”或“矿手”，前者是生产資料所有者，后者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及生产技术，这样必然在“自由”条件下被人雇佣，^⑧因此商品生产在封建社会末期便成为資本主义萌芽的前提。

三、官营矿业中劳役制度的瓦解， 民营矿业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明代嘉靖万历以前，官营矿业是最主要的最普遍的经营方式。当时政府在产矿区域或冶炼所在地設立专门管理机构，通常称为“矿场局”或“炉局”，管理采冶矿场，督办銀課及巡視矿场，鎮压矿工反抗等有关事项。^⑨这分明是为了强制生产而

設立的，它是封建性質的。机关的主管人員大抵由朝廷指派地方上的都指揮使司的僉事、布政司的參議充当，有时亦由中央直接派出朝廷官吏充当，其初多用御史、郎中及監生等，有时亦用中官，直到天順以后始多用中官，称为“矿使”，^⑩迨万历二十九年，政府“給以关防，令其兼領稅收”，^⑪因此又称“稅使”。此外还有守护矿场、“炉局”的防軍。可见其管理机构相当庞大，管理系统完备，主管官地位高，权力大。

机关成立后，即着手組織劳动力，进行生产，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的矿課。由于劳动力的来源及生产情况、采矿和冶炼各省很不一致，而且屡有变更，情况相当复杂，为了便于叙述，仅以冶铁和采銀为例，綜合分述于后：

冶炼和采銀的劳动力来源，都是从軍队抽調来的卫軍和派送來服劳役的囚人，冶铁則有征募来的民夫民匠（按即住坐民匠）及固定的輪班人匠，采銀有招集来的貧民。明代官营最大的遵化冶铁厂，工人的工作時間，民夫民匠及軍夫軍匠是“每年十月上

- ① 馬欢：“瀛涯胜覽”；費信：“星槎胜覽”；张燮：“东西洋考”卷五；郑若曾：“开阳杂著”卷四；姚叔祥：“见只編”。
- ② 关于奥塔加阿的論文材料，轉引賴家度：“‘天工开物’的著者——宋应星”一文，載1951年9月号历史教学。
- ③ 明汪道昆撰：“太函集”〔万历刻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室〕卷二八：“詹处士传”。
- ④ 同上，卷四六：“处士郑次公墓志銘”。
- ⑤ 张岱：“陶庵梦忆”頁二一。
- ⑥ 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一五：“貨語”。
- ⑦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頁一二六。
- ⑧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頁一七六。
- ⑨ 梁方仲：“明代銀矿考”，載1936年6月号“中国社会經济集刊”六卷一期。
- ⑩ 梁方仲：明代銀矿考。梁先生文章所指的中官是督办銀課而委派的，但其实中官亦主办其他矿业，如永乐十三年太監王房就在辽东經營金矿，可証之。
- ⑪ “乾隆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三。

工，次年四月放工。”輪班人匠是“岁分为四班，按季办柴炭鉄砂。”就是按季輪班工作，这都是带有季节性质的。至于囚人的工作時間，是沒有规定的。他們的待遇各有不同，除輪班匠人未知外，凡“民夫民匠月支口粮三斗，放工准支，軍夫軍匠月粮六斗，行粮三斗……各軍俱給冬夏布二匹，棉花二斤八兩，……囚人每日給粟米一升。”

至于使用卫軍与貧民采銀情况，亦各有特点。以云南为例：

云南銀矿中所使用的卫軍，其初“岁給粮布”，弘治間始廢，改为由卫軍中的余丁每三人至五人合出一矿夫的口粮，名曰：“丁夫乾賦”。^①政府不問实际的生产情况如何？每年必需繳足一定額的銀課，因此他們每遇到“洞深利小”时，“煎办不足”，而要“典妻鬻子，賠补其数，甚至流徙逃亡，哨聚为盜”。^②痛苦不堪。

云南銀矿中所使用的貧民，是用按戶抽丁的办法，招集来的。把貧穷的戶丁編为“矿夫”或“坑戶”，从事采銀劳动；富戶則被編为“硎头”或“坑首”，負責繳办銀課，管理和監督“矿夫”或“矿戶”的劳动。^③

但政府經營采矿，成本大，产量十分低微，“得不偿所費”。“宣德間……〔河南〕嵩县白泥沟地产銀矿……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集民丁发地，得銀砂四千余斤，烹三十余日，計用入力三千七百，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④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政府經營矿业中，所使用的劳动者囚人入大都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人，沒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民夫民匠軍夫軍匠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对于差派的劳役是必須承当的，匠戶对于主管的劳役机关更有身份的直接隶属关系，比其他劳动者更有多一层的束縛。招募来的民夫，可能在形式上是給以自然物或貨币作报酬，类似工資，但本質上不是劳动力的出賣，而是劳动者对封建专制主义者人格的依附。（二）在劳役制度下，封建统治者强制着劳动者，在食不飽穿不暖的极端痛苦生活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甚至矿产低微，亦要按定額繳交砂課，自然对生产不感兴趣，甚至紛紛逃亡，这样生产率当然不可能提高。以遵化冶鉄厂的产量來說，嘉靖八年較正德四年，大鑪就减少了七座，生鉄减少了234,000斤，白作鑪减少了几座不明，不过熟鉄就减少了80,000斤，总計各种鉄的产量共减少了326,000斤，差不多减少了

一半，可见其产量下降十分利害，到了已經不能保証正常生产的境地，怪不得时人議論官营矿业时，常发出“矿利甚微”之叹。^⑤这就說明劳役制度成为阻碍和束縛官营矿业的桎梏！

面临着这种严重的情况，统治者无法从采矿和冶炼收到滿足自己慾望的利益，于是到万历年間，当官营矿业无法維持正常生产的时候，只好改变剝削形式，采取征銀办法。

这个办法的改变，說明官营矿业中劳役制度到万历年間已經瓦解了。封建劳役制度的主要基础是“自然經濟、地主世袭領地之閉关自守性和自給自足性。”^⑥这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以商品經濟不发达为前提的，但是，中国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明初城乡經濟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开始繁荣，国内外貿易的結果，商品經濟就活跃起来了，促使“自然經濟基础”在某些商品經濟較发达的地区开始分解，这就势必影响到劳役制度的瓦解和崩潰。列宁指出：“商品經濟底增长是和工役制不相容的（按：列宁同时还說劳役經濟底特征差不多完全适用于工役制。即这里的工役制也适用于劳役制，虽然工役制是劳役制的繼續，是过渡形式。——作者）……而商品經濟与商业性农业之每一步发展都摧毁着实现它的条件。”^⑦作为官营矿业的基础——劳役制度瓦解和崩潰了，因此官营矿业也就相应地衰落了。

政府从劳役制的剝削形式改为征銀的剝削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农民經濟还没有完全脫离地主經濟……沒有这些土地(或地役权)，农民就完全不能够經營独立的經濟，于是地主們就有可能以工役形式繼續旧經濟制度。‘超經濟强制’的可能性依旧存在”。^⑧因此农民不得不暫時忍受着这种剝削，但是这种剝削形式的改变，不仅

①② “乾隆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三。

③ “通鑑綱目”三編：“銀場凡百器用，皆出自民間”。轉引梁方仲：“明代矿銀考”。

④ 陈繼登：“典故紀聞”卷一〇。

⑤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戶部尚書陈藻疏陈三事。

⑥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93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頁一四四。

⑦ 同上书，頁一五四至一五五。

⑧ 同上书，頁一四四至一四五。

說明矿產的市場廣泛興起，礦業商品生產普遍化了，政府可以用不着親自派官經營，譬如說只要將“額設的民夫匠價地租銀，征收解部”，就可以“買鐵使用”了；而且將產生三個效果：（一）政府不論采礦與否？一律按稅糧或地畝攤派礦課，稅額很高，加以礦稅使“課外索賂”，結果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形成歷史上所謂“礦稅之禍”。（二）這種剝削形式的改變，只要繳交礦課給政府，就可以自由經營礦業，從前對礦業嚴密的統制政策徹底鬆弛，這樣就給民營礦業的發展揮清了障礙。（三）封建的勞役制度的瓦解，即意味著封建生產關係中的人格隸屬關係開始鬆弛，勢必促進僱傭勞動的出現，在冶礦業中產生新的僱主與工資勞動者的生產關係，從此，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就應運而產生。

關於民營礦業中使用僱傭勞動的情況，史籍記載不具體，只可以隱約地看出一些痕跡。如“廣東之為鐵冶于利固肥。……凡諸惠等處系無主官山，產生鐵礦，先年節被本土射利奸民號山主礦主名色，招引福建上杭等縣無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際，糾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來分布各處山崗創寮住筍。每山起爐，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每爐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礦，煽鐵取利。山主礦主利其租稅，地鬼總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① 這裡說明采礦冶鐵經營中有三種身份不同的人：一是“山主”，即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二是“礦主”，即直接經營礦業的企業主，掌握全部的生產資料，三是被“礦主”雇募來的“無籍流徒”即是被農業排斥出來的農村無產者及“土脚小民”，從事采礦冶鐵的勞動。“山主”和“礦主”的關係是地租關係。“礦主”和“無籍流徒”及“土脚小民”，沒有人身依附的關係，只是勞動力的買賣關係，這顯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廣東民營冶鐵業的經營規模十分龐大，一個“礦主”會使用着1,800至6,000僱傭工人左右。再從產量看，嘉靖元年潮州、惠州等處冶鐵，交納政府的鐵課銀5,576兩，稅率是產鐵萬斤交銀三兩，即實際產量是18,586,667斤，相當於明初三省冶鐵廠的產量，嘉靖十年的產量是27,633,333斤，比嘉靖元年增長了1.48倍，可見廣東民營冶鐵發展趨勢，已經超過明初官營冶鐵最旺盛時期。

上例說明明代民營礦業生產單位中，出現了企業主與僱傭勞動者，他們之間無人身依附關係，是

受着資本支配的勞動關係，在勞動市場上，勞動者是作為商品所有者，作為本身勞動力所有者而出現的，企業主用資本將他們購買，目的在於通過他們進行商品生產，增殖資本的價值，顯然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下的僱傭勞動。

明代史籍記載僱傭勞動雖然不夠具體，這對於研究資本主義因素萌芽是很大的缺陷，但我們不能夠因為這種缺陷存在而否定存在着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史籍記載關於僱傭勞動的例子，有時僅一“雇”字或“雇募”二字，如果似一些研究者那樣把這“雇”字或“雇募”二字與史記所載的“雇”字或“雇募”二字等量齊觀，那是不恰當的，這是由社會性質不同而決定的。

民營礦業使用僱傭勞動比官營礦業使用勞役勞動進行生產，確是先進得多，雖然同樣是殘酷的剝削勞動者，但它畢竟能刺激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誘惑勞動者“爭力作以稱”，促進營“業大饒”。因此明代礦業發展的總趨勢——官礦走向衰落，民礦走向發展，這主要是由於不同的生產關係性質所決定的。民營礦業中，資本雄厚，使用着大量勞動者進行商品生產，必然奠定分工的精細和技術改革的基礎。

四、明代礦業中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的特點

明代商人比明前各代商人大規模的經營礦業，說明以商人為代表的商業資本直接控制了生產，與礦業結合為手工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的作用不再是僅擔當商品交換的媒介了，它把封建手工業的學徒關係改變為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的關係，因此是封建生產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的標志之一。^② 歷史事實證明明代礦業某些生產單位中，確是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關係——占有生產資料的企業主和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他們的關係是資本支配勞動的關係。企業主掌握大量的資本，使用着大批僱傭勞動者，在各種不同的生產單位上，實行精細分工，運用優良的技術，從事某一種專業性的勞動，為了盈利進行商品生產，增殖資本的價值。這種手工業，顯然不是簡單協作而是工場手工業了。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標志，

① 戴璟輯：嘉靖“廣東通志初稿（藍圖晒印，藏廣東中山圖書館）卷三十，頁六。

②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冊頁五四。

这正如馬克思所說：“很多工人在同一时候，同一地方（或者可以說在同一劳动场所）在同一資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一种商品，这在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①因此有些学者怀疑明代矿业中存在着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是没有根据的。

明代矿业中的資本主义因素萌芽，除和一般的資本主义因素萌芽有共同的特点外，由于明代封建制度及矿业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也有它的特点。白寿彝先生指出三点：（一）封建政权的压迫摧残特别显著；（二）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者身份的人仍存在，这说明明代矿业中資本主义领域的狭小；（三）在明代民矿矿主中，不免有“势家”、官僚、地主以及“讀書論世”所說“中官以已貲率百人开采”，但这些經營仍然是以資本关系为基础，并不因矿主之依仗封建势力而妨碍其資本主义性质的存在。这些特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对白先生所說的第二个特点即以官营的遵化冶鉄厂关于輪班工匠“夏月采石，秋月淘沙，冬月开炉”季节性的分工来说明生产者是具有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者身份問題，我认为这些輪班工匠是在劳役制度下进行生产的，其經營是带有十分浓厚的封建性质的，这就談不上資本主义因素萌芽，必須將官营和民营矿业严格区别开来。因此用这类例子来说明第二个特点，我认为不妥当。

关于明代矿业中資本主义因素萌芽的特点；我想补充三点：

第一，明代矿业中的資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内部的精細分工，逐漸引起地域的分工，分工的发展，結果是“从农民中間分出專門匠人，非农业的工场手工业中心也形成起来。^②如当塗农民学会了“鑄銅，範鉛錫”后，“則挾操作之手而走他方。^③广东佛山也出现了这些相类似的專門匠人，“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④这种从农民分化出来的專門匠人，是資本家最喜欢雇募的，而且受到特殊的“尊奉”，这主要是因为他們具有优秀的技术。显然的，这种劳資关系是自由的。同时也說明农业开始分离，非农业的工场手工业中心逐渐形成，专业性的城鎮就必然出现。^⑤“吳江县志”載：“苏州庵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間，开始为市，时居民将百家，鉄工过半。”^⑥这说明苏州庵村市在明初还是單純的恬靜的乡村，到嘉靖以后一变而为冶鉄手工业劳动者居半的新型的手工业商业小市鎮了。类似这种性质的小市鎮，还有檀丘市，

史称：“檀丘市〔震泽县〕……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鉄冶为业，至嘉靖間数倍于昔。凡銅鉄木坊杂艺諸工皆备，迄今居民日增，貨物并集，亦頗喧盛。”^⑦以冶鑄为专业性的城鎮，最明显的还有华州的柳子鎮和桐乡的炉鎮了。史載：“〔陝西省华州〕郡之柳子鎮有千家鉄匠，作刀剪斧之用。”該郡之西关，完全經營礎鋼針业的，且“頗足府仰之資。”^⑧“〔炉鎮〕去（桐乡）县治西北十余里，居民以冶鑄为业，炉火不絕。”^⑨专业性城鎮的特点是生产集中。这和中世紀时代一条街坊分布一种行业的零星的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地域的分工和专业性的城鎮出现，决不是在封建自然經濟下的小手工业生产所能引起的，就是說自然經濟下的小手工业生产不能带来大量的商业交往，不能破坏自然經濟下的区域的閉关状态，促进大批工人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并在这些地方按照商品专门化进行分工，只有資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是以相当广闊的商业交往为前提”，才能“破坏了这种区域的閉关状态，促成作坊和大批工人之轉移到其他地方。工场手工业不仅創造了广闊的区域，并且还在这种区域内实行专门化（按商品的分工）。”^⑩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頁二八七。

② 同上，頁三一四。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太平府风俗考”。

④ 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一六。

⑤ 王士性：“广志釋”卷五頁一九載炉场周围，“商賈則酤者、屠者、漁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可见由于劳动者需要生活必須品，市场形成是必然的，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明代矿业处在深山大谷之中，是处于商品經濟体系以外的，从而否定資本主义因素萌芽，是毫无根据的，錯誤的。

⑥ “吳江县志”，戴候外廬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頁六。

⑦ 陈和志修：“震泽县志”〔乾隆十一年版〕卷四二“鎮市村”。

⑧ 明张完考撰：“华州志”〔隆庆刻本〕卷之九“物产述”。

⑨ 徐炳元：“桐乡县志”卷一：“市鎮”。类似例子，还很多，今不备举。

⑩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頁三五六。

因此，地域的分工和专业性城镇的出现，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矿业工场手工业的特点。

第二、从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来考察，矿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正是明代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上所述，商品经济较薄弱的地区，民营矿业中还是在工役制度下进行生产。譬如云南矿业情况，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五指出：

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矿者，细民自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矿者，某处出矿苗，其矿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矿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矿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矿，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矿头任之，矿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矿已成矿，可煎炼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矿，至暮，展矿中出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矿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矿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

这里说明：（一）生产组织中，有“矿头”和“义夫”两种人，他们之间，似乎无人身依附关系，“义夫”是“矿头”招集来的，是直接从事采矿生产的劳动者，他们不一定是使用自己的工具。“矿头”负责垫付“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这种费用的支出，有“用至千百金者”。（二）产品除支付矿课及抵消成本外，是按照对分制分配的，把产品“画其中为四聚”，一聚作矿课缴交官府，一聚大概价值相当于“矿头”早先垫付的“公私用度之费”的产品，属于矿头，“以入簿支销者也”，还有一聚也是属矿头的，是作为纯利润收入的，一聚是属于“义夫”的，作为实物工资的收入。由此可见这种经营形式是在工役制度下进行生产的，“矿头”对劳动者的剥削十分残酷，迫使“义夫”到处找矿，增强了劳动强度。我们知道工役制度是劳役制度的继续，是劳役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过渡形式，因此它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进行生产，是落后的。

其次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物物交换的原始形态，

如山西泽州阳城出产的铁，是运到曲澳县换盐的。史称：“山西泽州阳城县产铁甚残（拟为贱？）……往年泽州人每以铁一百斤至曲澳县易盐二百斤，以此陕西铁价稍贱。”^①

这显然是原始的物物交换的表现形态，马克思指出：“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是表示商品的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是使用价值的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姿态”，^②显然这是原始的落后的形态。

矿业发展不平衡性，是明代矿业资本主义因素萌芽不能在全国普遍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明代矿业资本主义因素萌芽领域狭小的主要原因，这是明代内部经济发展和土地广大所规定的。

第三，从明代矿业经营中，可以看到高利贷、商业资本渗进了工业中，它们如何牢固地和工业资本密切地联系着，共同剥削工人。譬如嘉靖时戴璟指出：广东潮惠等地的矿场，就有高利贷者“预来生放银钱”给劳动者的事。海阳新溪朱处士，不仅是个企业主，而且也是个高利贷者，乘着“会岁不登”，“贷诸佣人钱百万”，籍此控制和剥削工人^③。又如以上所述的那些四川“商人贩铜者”及北直隶河间府的“贩铁者”，都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从企业主或小商品生产者手中买到产品，然后将产品运到各地，卖给消费者，目的是为卖而买，从买卖过程中（即商品流通过程中），获取利润。这种商业资本仅仅是担任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及工业资本牢固地密切联系着，是资本主义矿业工场手工业特色之一。

以上这些特点，正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使中国矿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沿着保守的道路进行，而有区别于西欧之沿着典型的道路进行。但尽管如此，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毕竟打开了封建统治的缺口，为以后矿业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直接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应该考虑为中国封建社会本身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

① “宪宗实录”卷一二二。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5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页二三。

③ 明汪道昆撰：“太函集”（万历刻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室）卷四七：“海洋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工人學理論的方法問題

集名

編者按：本刊五月號上發表了梁克同志“堅持‘理論與實際相聯繫’的學習原則”一文之後，接到一些讀者來信和來稿，對該文提出的一些論點和提法，表示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目前正在加強理論學習，認真探討和正確理解“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必要通過自由討論，進行具體的深刻的探討。我們歡迎大家參加討論。

理論同實際相結合這一理論學習的根本原則，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但承認它，不等於已經正確地理解和運用它。正如有了正確的方針路綫之後，要達到預期的效果，還必須有正確的工作方法一樣，要貫徹這個原則，有賴於在學習過程中採取正確的方法。

在去年以來工人學理論的高潮中，群眾創造了一種新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習方法，那就是從實際出發，按當前實際鬥爭的需要選擇密切相關的課題，從對生產和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的鳴放辯論入手，以理論原理為指導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推動生產大躍進。實踐證明，這是一種良好理論學習的方法。

對於這種新的理論學習的方法，人們有不同的評價。“理論與實踐”今年第五期發表了梁克同志的《堅持“理論與實際相聯繫”的學習原則》一文，旨在糾正某些對學習理論的方法問題上的片面認識。對於作者的這種意圖，以及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些正確的見解，如提倡認真讀書；加強對工人學理論的輔導；基礎理論學習和時事政策學習相結合等。我們都表示同意。但是在詳細閱讀該文之後，我們覺得還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

梁克同志在評價工人學理論的方法時說：“曾經有人把先擺問題，鳴放、辯論、

抓住矛盾，再閱讀文件、書籍，然後以之分析解決問題，或先鳴放、擺問題，再閱讀，然後再展開爭辯的方法，稱之為符合‘實際——理論——實際’的從實際出發的公式，……這樣的理解‘從實際出發’學理論，顯然是從形式看問題。”（見上引“理論與實踐”梁克同志的文章，下文有括弧而未註明出處的，均同）言下之意，工人採取這種學習方法，並沒有解決“從實際出發學理論的實質問題。”那麼，應該用怎樣的方法才算解決從實際出發學理論的實質問題呢？我們沒有從文章中看到具體明確的答案。但文章卻着重地談到：必須“弄通理論的精神和實質，然後再運用於實際，以之分析解決實際問題。”或者是“首先閱讀書本，領會其精神實質，根據內容，再擺情況，提問題，以理論的精神實質對問題展開研究分析。”于是他提出了“先精通而後聯繫”或“先精通而後運用”的公式，似乎只有按照這個公式去學習才能解決從實際出發學理論的實質問題。似此看問題，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階段論，把應該貫通整個學習過程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作了機械的劃分：先要把書讀通，讀通以後才去聯繫。很明顯，這是“從書本”、“從體系”出發的公式，這是與梁克同志自己所肯定的“從實際出發”相矛盾

的。

从这样的见解出发，梁克同志认定现在工人的学习不算得是理论学习，只能是一些内容“零碎片断”的时事政策学习或业务学习，因为这种学习“是以业务为中心，以理论为指导，并非以理论学习为中心，联系实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学理论若不以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理论为指导，其结果必然是为理论而学理论，这种学习就象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①我们认为，必须坚决贯彻“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②这就要从实际出发学理论。毛主席在解释什么叫做有的放矢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③梁克同志忽略了毛主席的这些极其重要而又具体明确的指示，当然会引出“以理论为中心，联系实际”的错误结论。

上述从实际出发，通过鸣放辩论，发现实际问题然后学习有关的理论原理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人学理论的方法，我们认为能够很好地体现毛主席所指示的“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理论学习的原则的。因为，第一，能紧密结合和服务于当前的实践需要，起到提高思想、促进生产的作用；第二，比较容易为工人所接受，有利于破除迷信、解

放思想，并且边学边用，既易于巩固，不易回生，增强工人学理论的自觉性；又能较扎实地逐步地学到基本理论知识。第三，学习时间较易安排，生产大忙时，也比较地不致陷于停顿。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它是符合实际——理论——实际的学习公式，因而也是工人学理论的一种好方法。在去年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工人学哲学的座谈会上，天津第一食品加工厂的老工人魏长庚介绍他们工厂工人学哲学，也是根据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提出课题，由大家运用哲学武器进行具体分析，找出解决办法，因此解决了许多生产关键问题。当时康生同志对这种学习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工人学理论是为了找办法解决生产上的问题，这就是从生产实际出发，经过学习理论，解放思想，然后又回到生产中去，发展生产。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④如此看来，不能说这种学习方法仅仅适用于工人学理论的初期，就是在提高的过程中，它仍然是一个良好的方法。

当然，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学习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实际出发，丝毫不排斥多样性，比如说，按照提纲去学，由第一章依次学到最后一章，只要是从实际需要出发，适合学习者的水平，不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做到学用一致，亦未尝不可。但就目前大多数工人的情况来看，那样做不易做好，也不易坚持。比较现实的做法还是在去年已经取得的理论学习方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一步，适当地按实际需要增加基础知识的分量，使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该厂工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97页。

^②同上第803页。

^③同上第801页。

^④人民日报1958年8月6日。

将近一年来的理論学习，不仅解决了許多生产上的問題，而且学了不少哲学的基础理論，他們讀了毛主席的“矛盾論”、“实践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最近又結合企业整頓生产秩序开始了政治經济学常識的学习。所有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为生产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在，他們又进一步訂出了工人学理論的两年规划和半年的具体計劃，要求在下半年內除了結合实际繼續学一些哲学基础知识之外，还要学一些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基础知識（主要是社会主义經济规律和企业管 理問題），爭取在两年內把这两門基础課程学完。如果說这样来計劃和安排学习，也还是沒有計劃性、系統性，那我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計劃性”、“系統性”了。我們認為，这样的学习，是具体解决“做什么学什么”（就实論虛）与系統的馬列主义基础知识学习的結合問題，做到边做边学，边学边用，因而也就把馬列主义理論与具体实践紧密地結合起来。

作为学习的具体步驟來說，如果把鳴放、讀書、辯論、講課等各个环节，机械地理解为互不联系的，自然是不对的。在学习过程中，“有时是先鳴放辯論，然后讀書（或講課），再辯論，有时是先讀書然后鳴放辯論，亦有时候是边鳴放边辯論边讀書，或边讀書边鳴放边辯論，都可以看具体情况如何而定。因此，步驟之中的各个环节，誰先誰后，或者交叉运用，都可以灵活掌握，只要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論联系实际就得了。在这一点上，我們不象梁克同志那样把它看的太死。一般來說，让工人从生产实际問題談起，学来比較自然，并不会产生象梁克同志所耽心的那种情况：“如果不首先弄清楚所要学的理論內容究竟是什么，……根据什么来摆情况？”因为这些实际問題是工人們所熟悉的。

任何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工人学理論

的方法問題，它的一些具体内容不可能永远是老样子。事实上，今年比去年就有了发展，过去的“鳴放，讀書，辯論”的学习方法，已經进一步具体化为两个“四結合”——学、用、講、写四結合和鳴放辯論、听課、讀書、調查研究四結合。其中最根本的是学用結合，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学为了用，学了就用，边学边用。这就是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理性知識，用来指导日常生产实际，并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对已經学过的理論的認識，从而巩固学习成果。如果仅仅在口头上懂得背誦一些理論原則，而不能应用理論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那就脱离实际。

“只有把理性認識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論于实践，看它是否能达到預想的目的。”^①这是衡量理論是否联系实际的主要标尺。第二，在实践中去学习。毛主席說：“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常常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干就是学。”^②工人为了解决生产、工作中的实际問題而去学习理論，在实践中学习，边学边用，不正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

为了在工人学习理論这一工作中貫徹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必須在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則下，既要自下而上的群众鳴放辯論，又要自上而下的正面講授理論基础知识。过去我們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工作做得少了一些。今年注意了，就多給工人講些輔導課。我們強調从实际出发学理論，并不反对上大課，恰恰相反，需要給工人做更細致更具体的輔導工作。因为目前大多数工人閱讀文件仍有困难，理論知識也不足。这样做能够使工人的理論学习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問題是怎样去給工人講理論輔導課，我們看到两种不同的做法。有的人还没有摸清实际（生

^①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1頁。

^②同上第174頁。

产和思想)中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不问工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只凭书本上的原理,就主观地写个讲课提纲,照本宣科。结果工人听了不能解决问题,效果很差。象这样一类讲课,我们要力求避免。另外一种是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的大课,掌握了群众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从鸣放辩论中得到),然后用理论来说明当前的实际问题。这样一种把讲者和听者结合起来的方法,讲者就能做到有的放矢,听者也就格外留神,容易理解。这样的大课,群众很欢迎,要求多讲。可见,要讲好大课,同样是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在学习过程中,还要把调查研究 and 读书结合起来。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空谈理论不谈实际,和只谈具体问题不谈理论这两种偏向,从而树立起严肃认真的学习风气。广州中一烟厂工人今年初学习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时,以“加快卷烟机转速是否一定多出废品”为例进行辩论,干部和工人都分头下

车间调查搜集车速加快前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种学习,正符合毛主席所教导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为了把工人学理论提高一步,应该通过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明确方向,而不是否定过去的做法去另搞一套,更不应该走回头路。我们不否认,工人的理论学习中还有许多缺点,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一部分工厂中确实存在“零打碎敲”、“就事论事”和停滞不前的现象,但这决不是因为他们贯彻“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领导抓不紧,骨干和辅导力量不足,往往是主要因素。我们相信,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和所有理论工作者的努力,这些缺点是可以初步克服的,工人学理论一定会搞的更好,成绩更大。希望关心工人学理论的理论工作者,都争取机会到工人群众中去做些辅导工作,以便总结更好的经验来指导学习。

广州市举办“工人业余理论学习讲座”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于六月初举办了一个“工人业余理论学习讲座”,目的是:调查生产好和学习好的工人听课,使他们有系统地学好一些理论上的基本知识,回到本单位担任工人理论学习的辅导工作,以提高广州市工人理论学习的質量。

讲座是通过大鸣大放结合当前中心工作,系统地讲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知识。第一课于六月四日开始,参加人数为150人,课后分小组进行座谈,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学员都认为,这个课联系了实际,所讲的都是当前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使人很容易领会,对当前整顿生产秩序很有帮助。由于他们觉得这个讲座重要,因而很多单位都要求增加学位。目前参加学习的已增加到250人,决定于六月十八日讲第二课。还准备开设一个哲学常识讲座。(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

怎样正确理解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

——与梁克同志商榷

房松 郑凌华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梁克同志在“理論与实践”今年第五期“坚持‘理論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则”一文里肯定了它的正确性，这是对的。但是当論述到如何理解和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时，梁克同志的一些见解却值得商榷了。在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理論学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理論联系实际。贯彻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将使馬克思主义理論向前发展。我們党和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設的过程中，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使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設工作开了花、結了果。

与此相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却是理論与实际相分离的，其特点是：“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年版，第817頁）。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我們是要反对的。梁克同志在文章中也談到必須反对教条主义，但与此同时，却又提出了要“先精通而后运用”。（见上引“理論与实践”梁克同志的文章，下文有括弧而未注明出处的均同）要运用就必须精通，越精通，运用起来就越純熟，这是无可非議的。但是否应该

把“精通”与“运用”分成二个段落？如何去求得“精通”？这是学习馬克思主义的人都很关心的問題。也是提高的中心問題。“先精通而后运用”，照梁克同志的解释，就是“学习馬列主义理論必須認真讀書，要通过粗讀、細讀、精通的各个阶段，要反复多次，直至弄通理論的精神和实质，然后再运用于实际，以之分析解决实际問題”。（重点是我們加的——作者）梁克同志在文章里沒有提到“粗讀、細讀、精讀”的同时必須和实际紧密结合，也沒有提到是从什么出发去“精讀”。究竟“从实际出发”去进行“精讀”？还是从“理論出发”？这是关系到学习的目的性問題。虽然往后梁克同志提到“只要学习的思想和学习方法对头，采取那一种形式，都可以达到目的要求”。但是由于出发点不明确，因此就难免使人看了之后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梁克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肯定了教条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們“……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年版第821頁）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学习理論要有目的，要和实际紧密结合，即“从实际出发”去进行学习研究，才能求得精通与运用。离开实际，即离开当前的革命实际問題去进行学习，是永

远也不能领会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从实际出发的理論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已为实践所証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重要方法。对于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同志曾經作了精辟的說明，他說：

“在我們党校中，可能有二种方法来培养干部。

第一种方法，用抽象的理論来培养人，尽力給他們灌輸一大堆枯燥知識，教他們用美丽的詞句起草提綱和決議，而对該国的問題，該国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历史等問題，以及該国共产党的传统与經驗，仅仅只是順便涉及，仅仅只是順便涉及！

第二种方法，是这样的一种理論学习，即使学生們在实际研究本国无产阶级底根本問題的基础上，去领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便他們重新回到实际工作中去的时候，能够独立地識別环境，能够成为独立的实际組織者，領導者，有能力引导群众去作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159—160頁）

季米特洛夫同志这一段話，肯定了这样一个問題，即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論出发；是以研究革命实际为中心，以馬列主义为指导，而不是相反。梁克同志在文章中提出的“以理論学习为中心，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从“先精通而后运用”的原则引申出来的，是“直至弄通理論的精神和实质”、“然后再运用于实际”的另一种提法。我們认为如果按照梁克同志这样的解释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去学习，恐怕只能收到对实际問題“仅仅順便涉及”的結果。

从实际出发来学习理論是正确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它。我們与梁克同志一样认为不能把从实际出发只是简单的理解为“做什么，学什么”，因为这个口号是针对业务学习而言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通过的決定就指出过：“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須給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67頁）。同样也不能把从实际出发理解为只是为了解决一、二个具体任务来进行学习。这两种理解把从实际出发的方針看得太狹小了。照我們的理解，所謂从实际出发，就是“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列主义为指导”，也即是以研究党在一定的革命战略阶段的任务、部署、路綫、方針、政策为中心，从这出发去学习馬列主义。因为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实际問題，往往是要从理論上去加以說明和解决的問題。从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出发来进行学习研究，是革命运动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例如在当前來說，实际生活中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如在分配方面国家与公社和个人的关系，按劳分配的原则，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实际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也是理論問題。从这些实际問題出发来进行学习，正是“有的放矢”的方法，是理論与实践統一的具体体现，也并没有否定系統的学习。

关于系統学习問題，我們也认为必須有正确的理解。例如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課程”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又如学习“馬恩列斯論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下册”等书的決定，也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要求。但是有人却认为这种学习内容的決定，不是系統的学习，反而认为只有按照馬克思主义三个組成部分逐章逐节的学习才算系統，因此他們对学习前两本书就不感兴趣，更錯誤的是把它和一般的方針政策的学习相提并論（这两种学习有它共同之处，但有所区别）。这种看法是十分錯誤的，怎么能說学习某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就不系統？我們并不反对，而且也主张更全面更系統的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学习

好，也不認為按照提綱來學習的本身，就是教條主義。問題是如何入手來學習。中共廣東省委主辦的“上游”雜誌今年第九期的社論“把理論學習推進一步”中指出：“這兩種方式，一種是以某一門基礎學科的邏輯體系為線索，或者以某部理論著作為中心。另一種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這裡的後一種方式，就是前述的那種較好的入手做法；在學習繼續提高中，它仍然是一種良好的方式。”因此不能說從實際出發，以實際問題為中心來進行學習，就不系統，就不正規。可惜，梁克同志在文章中對這種“入手做法”卻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比如梁克同志對工農學理論的方法，即“先擺問題，鳴放、辯論、抓住矛盾，再閱讀文件、書籍，然後以之分析解決問題，或先鳴放，擺問題，再閱讀，然後再展開辯論的方法”，就作了如下的評價：“在工農還未感覺到迫切需要理論學習和對理論學習還未發生興趣的情況，為了引導和掀起工農學理論的熱潮，有必要採取這種學習方法。然而，如果把這種辦法肯定為理論學習的最好辦法，甚至是唯一的辦法，那就會陷於片面性。”我們認為，這種學習方法不僅僅是一種方法和形式上的問題，而是關係到理論聯繫實際方針的貫徹問題。如果承認這種學習方法不是人為地稱之為符合“實際——理論——實際”，而是確實實體現了“實際——理論——實際”的話，那麼就不應該把這個公式簡單地理解為方法問題。當然，如果認為這樣的學習方法並不能真正體現這個公式，而是人為地“稱之為符合”於這個公式的話，那又當別論。既然這樣的學習方法能夠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那為什麼不可以肯定為工農學習理論的最好辦法？作為一種方法來說，任何時候都不能也不應把它看成是唯一的東西，可以有這樣的一種方法，也可以有那樣的一種方

法，至於那一種方法是好是壞，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和條件來靈活運用。

在評價客觀事物的好壞，不應該憑人們的主觀願望來決定，應該着重客觀的實際效果，就是說一切都要通過實踐才能檢驗真理，也只有實踐才是檢查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我們看來這種方法所以應該肯定，是因為它是群眾路綫的學習方法，也最容易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和接受，因而也特別受到工農群眾的歡迎。從採用這種學習方法的效果來看，也是卓著成效的。他們通過鳴放、辯論、讀書、輔導等形式，真正做到從實際出發，把理論和實際統一起來。這樣也就達到：既揭露和解決了生產、工作和思想上的問題，又把實際問題通過分析提到理論上來認識，從而使他們在工作、生產上更好的發揮主動作用。中一煙廠，益豐搪瓷廠和廣州造紙廠職工學習哲學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既然在實踐中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又為廣大群眾所歡迎，因此，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首先就要尊重廣大群眾的革命實踐。應該肯定：這種學習方法對於廣大的工農群眾不僅在理論學習的普及階段是一種好的入手做法，而且在學習的繼續提高中，仍然是一種良好的辦法。當然，這樣的一種方法決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着實踐的不斷發展，人們認識的逐步深化，也必然會給它以新的補充。但在目前情況下應該大力肯定這種學習方法的積極作用。我們這樣論述，並不排斥提倡別一種學習方法，但任何新的方法都須要在實踐中檢驗，首先要在工農群眾的理論學習中加以檢驗。如果強調肯定未經實踐檢驗的學習方法而對已經實踐檢驗為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則諸多指摘，這種態度，當然不能認為是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的態度。

提倡活讀書

章浦

书不可死讀，书而死讀，結果一定会連生气勃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书也讀成了死书。

蒲松齡聊齋志異有一則“书痴”的故事，他写顏如玉这个聪明的神女如何教书痴讀書，足以发人深省。顏如玉对于經常“誦声大作”却連“生孩子”也不懂的祁玉柱，教导之方第一是不准讀書，

第二是要学琴棋飲博，第三要出外交朋友。結果书痴讀書成名，而且还生了孩子。

这里所說的书，只是封建时代的“圣贤书”，“成名”也不过是猎取“一官半职”，但那样的讀書之道尙且要琴棋飲博，出外交朋友，“体验”一番，更何况我們生当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讀的又多是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活书”？

书要活讀，可說是天經地义了。所謂活讀，就是要求讀書能很好地掌握內容，領会精神實質，取精用宏，从而帮助和指导我們的实践。因此，要活讀書，就必須有活讀書的方法。

談到方法，首先令人想到的是“学”与“思”的关系。郭老要人“好讀書、好求甚解”，这自然是对的。因为“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則殆”，学与思的密切关系，二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已經知道。

学而不思，就是只管接受，不动脑筋，既不消化，又不能融会貫通，結果自然是迷迷糊糊，一无所得，或則光註別人在自己脑袋中跑馬，甚則給人牽了鼻子走，成了“迷

途的羔羊”。故孔老夫子諡之曰：“罔”。

思而不学就更不行了，抹煞前人的經驗教訓，否定文化遗产，想入非非，那就成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非大栽跟斗不可。所以孔老夫子警告道：“殆”。

又学又思，才能群书活讀，不在話下了；可是，还要注意怎样去“思”。

所謂思，絕不能是乱想胡思。而要思得好，就非在实践基础上去思，非要思行并进不可。因此，要提倡又学又思，更要提倡又思又行。

行，就是实践。我們的古人是知道行的重要的。中庸教人：博学、审問、慎思、明辨、篤行。蒲松齡教人体驗生活。暫勿論这里的行或生活都只是封建的、个人的行或生活，但对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启发。假如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的人，也摸索到一些实践、实际生活对讀書和思考的重要性，难道我們不是更應該通晓这个道理么？

思行并进，又思又行，对于讀書來說，主要包含有三个內容，即是：結合实际，学以致用，身体力行。

結合实际，可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讀書方法的不易原則。只有結合实际，我們才能脚踏实地地去学，脚踏实地地去思，才不会思出乱子，想入牛角尖；也只有結合实际，我們才能真正地領会书中的精神實質，才能找到书中知識的活源头，才能知道和学习先輩們如何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地点、時間考察、处理一切，总结經驗，提炼理論，鍛炼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

学以致用，首先指的是讀書的目的。一切應該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即使讀古书，也要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也就是接受前人的宝貴經驗，来帮助或指导我們当前的实

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否定人類的豐富的文化遺產，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求繼承人類全部的豐富的文化遺產，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單提倡活書活讀，而且還主張古書活讀，甚至死書活讀。

身體力行是最主要的環節，這既是從實際出發的開端，又是讀書的收穫階段。毛主席指出：我們認識的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比之于讀書，則是在實踐中讀書，掌握了理論和知識；又在理論與知識的指導下，從事實踐。換句話說，讀書與實踐相結合，勇猛精進，敢想，敢干。能夠這樣，書中的理論和知識就能掌握了人這一物質力量，發揮其巨大威力，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從而又改造人的自身。

要提倡活讀書。既要又學又思，又要又思又行，這才算得上活讀書。黨一貫大力提倡：勞動鍛煉，調查研究，鉅研理論，結合實際，敢想敢做，為政治、為生產服務，其理由正在此。只要我們能夠循此以往，就必然收穫豐盛，滿載而歸。

應該是多讀一些書的時候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今天，為了更好更適當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趕上客觀形勢的需要，冷靜而科學地分析現實，以指導及提高我們的热情洋溢的革命干劲。我們是需要很好地掌握活讀書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更多的知識，和更好地從前人、從古今中外的人類知識寶庫中吸取更多的有用東西的。

幽 靈 在 徘 徊

岑 桑

“死去的靈魂，在一定的意義上，那就完全是廢物。”——在《死魂靈》里，果戈里筆下的馬尼洛夫這樣說。可是故事里的另一主角乞乞科夫却並不同意這一說法，他意味深長地應道：“不完全是廢物！”

看來，乞乞科夫的觀點是被西方世界的頭目們所贊同了，他們正在為死去的幽靈招魂，要幽靈為他們永遠達不到的目的而服務。

在世界陰暗的角落里，人們遂看見幽靈在徘徊……

一、歷史從不發霉

歷史沒有發霉，歷史從不發霉。人們時常重溫歷史，讓它的教訓永遠新鮮。

在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的開頭，德國總統興登堡已是老態龍鍾了。儘管有一次他曾

經十分懊惱地說過，如果希特勒不去改一改狂妄之態來“彌補他的禮貌”的話，那麼，他就要任這個常常失態的人來當鄉村郵政局長了。

但是，老頭子的懊惱到頭來還是變成了屈從；希特勒並沒有做成鄉村郵政局長。1933年1月，他爬上德國總理的寶座去了。老朽的興登堡滿懷希望，讓他去“重建第三帝國”和“建立歐洲新秩序”。這個掌握了權柄的混世魔王，於是開始用他自己的這句格言去“指導”世界：——

“人是一生下來就有罪的。只有借助武力才能統治這些人。要威脅人的時候，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是許可的。”

1918年的干涉者們，並沒有從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土上達到他們卑鄙的目的。這時，他們看中這個“有抱負”的魔

鬼了。他們想到，利用这魔鬼去成全他們的“好事”，倒是很合化算的。于是，在慕尼黑，他們給魔鬼捧上了一盘带血的肉，对魔鬼說：“往东方去找寻你的新天地吧！”

可是，这魔鬼在吃过之后，并没有一下子就扑向它不能不感到害怕的苏維埃国家；它最初还是从自己的身边咬开去的。

1939年9月1日，德軍进攻波兰，战火开始在欧洲燃烧。希特勒是百分之百的忠于自己的格言了。

“把反对我們的每一个人都杀死！杀！杀！你們是不負責任的，由我負責。所以你們只管杀就是了！”納粹匪徒們忠实地执行了他們的头目的这一指示：坦克的履带拖着血淋淋的脏腑，撞向孕妇临盆的产房，飞机把炸弹傾泻在村鎮和城市；遍布欧洲的集中营、焚尸炉、屠场火海、血肉和肝脑，构成了希特勒所謳歌的“战争的美”。

战争终于以魔鬼的死亡而結束。十多年过去了，而欧洲的母亲們在和平而宁靜的夜晚入睡，还会在惊悸的梦中紧抱着怀里的嬰兒，从灯火管制和“容克”式飞机的嘯音的幻觉中惊醒。

历史沒有发霉，历史从不发霉。人們时常重溫历史，让它的教訓永远新鮮。

二、魂兮归来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头发庫里的每一絲头发，还在发出各种顏色的光泽，当納粹匪徒当年在欧洲遍設的万千个絞架的絞索，还似乎留存着死难者的絲絲暖意，艾森豪威尔就对魔鬼的后代說：“现在是忘記过去的时候了！”

是的，西方世界的头目們可以对一切都表示他們的“健忘”，如果这种表示是一种有利的做法的話。但是，他們却决不会忘記这样的——一个曾經敗露过的阴谋：給魔鬼一盘肉，指望它听从指使，向东方扑过去。艾森豪威尔的这番表示，难道会是出于騎士的

“俠义心肠”么？人們看见希特勒当年的“对手”，正在无限忏悔地为服毒而死的混世魔王高喊“魂兮归来”，指望那褐色的幽灵一同把刺刀和导弹的尖端指向东方。

“现在是忘記过去的时候了”——

“曾經帮助希特勒成为希特勒”的克魯伯，在服过了二十年刑期的四分之一的時候就被释放。这个曾經从每一具尸骸上面吸过血、在每一顆炸弹的嘯音中溶入自己的笑声的大軍火商和战争罪犯，早就重操故业，在西德制造足以使枪炮成为玩具的杀人利器。在紐伦堡法庭被判过罪的一个个大杀人犯，也早已从兰斯堡監獄^①里很体面的走出来，担任着比他們从前更为显赫的职务。

看吧，希特勒的宠儿們——六名前納粹政权的“部长”和部长級官員，早就在波恩的“部长”官邸中签署法令文件去；希特勒“人民法庭”和前“国防軍”的六百名法官，现在都是波恩司法界的紅員了，里宾特罗甫^②时代的外交人員，已經回到阿登納政府的外交部里，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外交官員的座席了；老牌的納粹外交家，已經掌握七十多个波恩大使館和公使館中的五十一个了。

看吧，四十五名希特勒时代的“上将”，都回复了昔年的凜凜威风，控制着将近二十万众的西德“国防軍”；那些說“现在是忘記过去的时候了”的人們，早已給一群大杀人犯开辟了生产原子武器的道路；西德“国防軍”歧孙司令部已經从美国部队那儿領来了“誠实的約翰”式导弹；十多年前曾經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指揮法西斯軍隊，把乌克兰几百个村庄夷为平地，在法国屠杀过万千妇孺的大劊子手，希特勒当年的亲信將領之一的汉斯·斯派达尔，现在竟“貴”为北大西洋集团中欧地面总司令了……。

請看吧，西方的招魂者虔誠的香烛，显

^① 战后主要的德国战犯的囚禁地。

^② 納粹德国的外交部长。

然已經收到了“成效”，人們看見希特勒的幽灵似乎从濃濃烟塵中冉冉上升，在欧洲上空往返徘徊，滿意地看到上面所說的一切。

幽灵在徘徊，它借着一群在波恩当权的，至今还在活着的徒子徒孙們，仿照当年的調子兴奋地嗥鳴着。波恩集团的著名人物雅谷·愷薩早就高喊道：德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他說他們要恢復的德国，除了德国、奥地利之外，还将包括部分瑞士、亚尔薩斯和洛林。1957年西德議會主席格斯登梅尔也露骨地叫嚷过：“在今后二十年中非洲的变化不仅与……目前的殖民国家有关，并且，毫无疑问也将与德国人有关。”那些一度尝过鉄窗风味，終又佩上了美国勳章的匪徒們，在酒酣耳热之际，互相拍着肩膀狂妄地議論起来了：

“我們的东方边界，应该在維斯杜拉河还是第聶伯河呢？”

“根据元首的遺訓，应该在鄂霍次克海边！”^①

三、历史不得重演！

幽灵在徘徊，一个慘澹的暗影投在欧洲的脊梁上。

但是，幽灵及其招魂者将会发觉，他們那复仇的、扩张的、侵略的狂热，只不过是历史的阴暗部分的点点磷火而已。强大的道义力量，正在以无可阻挡的严峻的光芒向他們逼射着，每一个阴森森的死去和活着的魔鬼們即使在狂妄嗥叫的时候，其内心也是在震盪着的。

“我們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一个雷霆万鈞的声音，一个足以使幽灵及其招魂者感到战慄和伤心的声音。这声音每时每刻都从世界上的每一个居民点裏鳴而起，在广阔无际的空間纵横迴蕩。

当日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已經成长了，寡妇們的眼泪已經流尽了，海底的沉船

的龙骨已經长滿珊瑚了……。人們需要誠实的劳动，需要工厂、耕地、学校和花园。这样善良的愿望正是古往今来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根据。为了焚尸炉不再冒烟，树樞上不再挂着肝肠；为了让美丽的爱情在宁静中誕生，为了让孙儿們都能听到老祖母說的故事，为了每一户人家都能在光明的灯下訴說欢乐，正直的人类正在手挽着手，用最庄严而恳切的心愿和不可摧毁的力量，在捍卫着他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和平！

历史不得重演！这洪亮的声音不单响彻宽阔的天地，同时也在世界上最阴暗的角落里震撼着魔鬼的兄弟們的心房。在伦敦，为参加英国皇室为紀念北大西洋集团成立十周年而举行的宴会，施施然来自波恩的汉斯·斯派达尔，不是已經惊惶地看到憤怒的示威群众和“納粹分子斯派达尔滚出去！”的巨幅标語了嗎？因为英国人民从这个活着的魔鬼前来的方向，不会不記得当年几使伦敦陷于毁灭的V₂无人飞机的航綫。在华盛顿，为杜勒斯之死而前往哭喪的阿登納，当也不难看到类似的景色；因为美国的母亲和妻子們，也不会不記得她們的儿子和丈夫当年葬身在什么地方。在波恩、科隆、汉堡和不来梅，正直的西德人民正在掀起反国軍对主义复活的运动，人們紛紛举行反对原子死亡的大游行，用严厉的声音詛咒着战争；因为他們不愿意德国的命运从阿登納手上重蹈当年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复轍……。

历史不得重演！幽灵及其招魂者的狐步舞是跳不长久的。如果幽灵果真“不完全是废物”，乞乞科夫的說法的确有他的几分道理的話，那么，希特勒的幽灵正在被派上了这样的用场：为自己的招魂者当一名守职尽責的向导，把他們引带到与自己比邻而居的墓穴。

^① 苏联西伯利亚东頻鄂霍次克海。



为什么要普遍开展 第三类物资交流?

問：为什么最近全国各地都普遍举行第三类物资交流会？开展第三类物资交流有什么重要意义？

佛山 伍俊基

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物资交流是商品流通也是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结合的重要形式，有计划地开展物资交流，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生产和消费以及各个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因此，有计划地开展物资交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加强计划领导，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一种重要经济活动形式。

我国当前商品流通的情况，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流通中的商品按其与国家计划的关系，区分为三类。其中关系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的第一、二类商品，已由国家分别采取集中管理和差额调拨的办法，直接纳入计划，有计划的开展流通和分配。而剩下的第三类商品，种类繁多，生产分散，需求变化大，不可能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因此，在整个商品流通中，如何将第三类商品纳入国家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流通，就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对原材料和人民生活的各种消费品的需要，都大大增加，使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从根本上发展生产之外，还有赖于大力组织货源，调剂余缺。但在公社化后，旧的产销协作关系有些脱节，新的产销关系又未迅速建立，各方面一时不能紧密连接起来。同时，人民公社大搞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时，也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与市场的需求联系起

来。在这情况下，大力组织物资交流，尤其是有组织地开展第三类物资的交流，就更为必要。

开展第三类物资交流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通过交流，使产需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新的情况下，彼此更加了解情况，互通有无；使被中断了的原有的合理协作关系，得到了恢复；不合理的协作关系作了适当的调整，并且建立了新的协作关系；同时还挖掘出不少新的货源。这样就促使市场活跃，商品流通扩大。以上海为例，在4月间举行的全国第三类物资交流大会上，上海乐器行业所用的特种竹木材料，去年被中断了供应，又得到了恢复。上海的劳动手套，过去供应苏北二万套，而江苏又供应上海四万六千套，会上经协商后，改为彼此间只由江苏供应上海二万六千套，避免了商品的迂回流转。在会上，上海和内蒙古签订了采购土毯子、皮硝、毛口袋等新的协议；吉林省过去把大量的家畜胎盘和人参叶子当作废物丢掉，经发现上海制药业需要后，立即发电回去组织收购，扩

大了上海制藥业原料的来源。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物資交流大会是有計劃有組織进行的。在县以上的交流大会上，对不同的商品采取不同的分配。其中对主要商品即工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关键性物資，人民生活不可少的消費品和比較重要的出口物品采取“产需平衡，合理分配”的办法。对于一般商品交流时，照顧到合理流轉方向和原有的产銷关系；对一般商品中的重点商品，还采取“适当掌握，組織交流”的办法。在作价时一般以公社以前的合理价格为基础，贯彻等价交换为原则。这样，通过交流，就合理分配了物資，照顧了不同地区和部門的需要；在目前物資供应較紧张的情况下，更是贯彻了在保证了重点的前提下照顧一般。因此，交流会实际上也是发挥协作和合理分配产品的重要形式，它在物資的流通和分配上成为国家直接計劃的补充。

其次，通过交流，还起着安排生产和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第三类商品不能直接纳入国家計劃，生产的盲目性較大。在交流会上，产需通过合同、協議等方式，将供貨的数量、品种、规格固定下来后，生产部門可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供貨計劃通过逐級召开交流会，一直安排到工厂、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样使各种物資生产得到落实的結果，从而也将第三类商品的生产間接纳入国家計劃，补充了国家的生产計劃。合理安排生产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发展。一方面，生产部門在交流中发现自己原来不生产而市场需要的、或生产少而市场需要量大的商品后，会增加生产。这在小土特产的生产和野生动物、植物的捕捉和采集上，表现得特別显著。同时，生产符合市场需要，产品銷售有保証，也必然会加速再生产。另一方面，通过交流，工业品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农业某些生产工具等得到供应，也促进生产发展。物資交流同时还組織了技术协作，交

流技术，以先进带动落后；組織了經濟协作，由要貨的地区或部門在工具和器材等方面支援生产部門，这也促使生产发展。例如在全国交流大会上，稻草袋子要貨七千万条，供貨只有四十五万条，相差悬殊，根本不能滿足需要，根据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稻草的情况，由江苏貴州等省派人带工具到不会編織稻草袋的地区传授技术，致稻草袋子的生产得到发展，因而能滿足市场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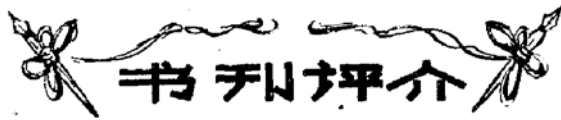
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通过物資交流有計劃安排生产和促进生产的結果，反过来也就能增加物資供应，扩大了商品流通。

再次，通过交流，調剂余缺，挖掘貨源，使现有商品更合理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市场供应紧张现象可起緩和作用，使缺乏的生活日用品适当得到供应。汕头专区的交流会，提供了小百貨三十万元，五金交电器材九十五万元，木屐四十七万双，这些原是脫銷的商品，现在补充了供应。加上通过交流促进生产，增加供应，就能更快使市场紧张情况得到克服。

最后，物資交流的开展，对人民公社和工农联盟的巩固，也有作用。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发展和社員生活提高。公社的生产方針是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粮食生产和多种經營并举。通过交流，促使公社多种經營发展，商品生产增加，在这基础上，社員的收入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增加。毫无疑问，这将促进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在有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商品交换。开展物資交流的結果，城乡之間、工农业之間的彼此供应将大大增加，其关系亦将更加密切。

总之，开展物資交流是我們当前經濟生活的一件大事，它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設和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将起重大作用。

（张思强）



評介“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朱玉德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本通俗性的社会科学讀物，篇幅不多，但基本上做到了簡明而通俗地論述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变化等基本的理論問題。人們弄清楚这些問題，就掌握了一把正确認識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鎖匙，就可以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中，認識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本书作者李又华同志較为通俗地解說了这些基本理論問題，为初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論的讀者提供一本較好的讀物。

本书作为一本通俗性的理論讀物，写得比較成功的地方，是較为深入浅出地說明問題，条理清楚，語言比較生动活泼，能結合实际。因此，对一些初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論的同志來說，是較容易接受的。作者在論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前，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論述了人类社会的产生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問題，帮助讀者正确認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們发展变化的规律。作者在闡明这两个問題时不仅根据恩格斯的学說来正面解說，而且还以历史事实批判了历史上曾經出现过的有关这問題的唯心主义和反动社会学的观点，并进而指出人类社会是劳动創造的，离开了劳动生产，根本就談不到人类社会的存在。人类社会发源于生产劳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生产

才能最后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性质。作者在这里还联系实际。說明这个基本原理对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懂得这个真理，才有助于我們認識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光荣和重要，从而認識知識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意义。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善于用人們熟悉的事例來說明問題和注意联系实际。这可从下面一些例子中看出来，比如作者在說明为什么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道理时，作者并没有引經据典，长篇大論，而是举出大家所熟悉的影片“白毛女”中的喜儿为例，說明喜儿到深山后所以能够独自生活和劳动，“一来依靠她从社会中学来的生活和劳动本領；二来她还經常拿人們在寺庙里供神的供品（社会生产品）来充飢。可见喜儿始終不是社会以外的人物，沒有完全脱离社会而生存。”这样来解說，自然比一般泛泛而論，更容易为讀者接受的。又如作者在解說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必須是这两方面的結合，和說明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后，指出：“因此考察社会生产发展时，不能只从生产的一个方面去看問題，这是十分重要的。旧中国一些資产階級学者，主张‘实业救国’。就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毒害的看法。这种人认为救中国不用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也就是叫人不要去改变这些旧的腐朽的

生产关系，只要去发展实业（即发展各种生产），就可以救中国。”（见该书第15页）这表明作者随时注意联系实际和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问题。

本书作者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在解说每一个问题时，基本上做到由近而远，由浅而深，层次分明，有条有理。这也是本书的特色和优点。比如在论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这一问题时，作者便首先把“社会的发展能超脱客观规律吗”这一问题谈清楚，然后再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对如何理解这个规律和它的作用，又明确地分为：“第一，在社会发展中，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然后人们之间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必然随着这种发展并适应这种发展而发生变化。第二，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时候，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无阻碍地充分发展，反之生产关系就会束缚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表现在社会发展中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就基本上不能再同生产力相适应，这时候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旧生产关系为新生生产关系所代替。第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作用，表现在生产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从旧的生产关系到新的生产关系。”经过这样的论述之后，作者又用专章进行关于“历史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并具体地就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更替的历史，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样层次分明，条理清楚，易为读者接受。这些虽是写作通俗读物的基本要求之一，但往往被一些作者所忽视，或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以致写出来的东西，不易为

一般读者所懂得。而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却尽了很大努力，在本书中基本上做到这一点。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自发性和自觉性这一题中，作者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长久地表现为自发过程，只是到了社会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认识到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的发展，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因而产生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时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才从自发过程转为自觉过程。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一般是自觉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有可能自觉的利用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的某些缺陷，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具有自觉的性质。作者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发展和社会革命；更好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者还专门论述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简明地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及其表现。因此，本书不仅有助于初学者学习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规律，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在个别章节中，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材料不够丰富充实，某些地方还写得不够通俗，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一题中，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只着重于一般理论分析和叙述，缺乏具体的现实材料，语言也就不够生动活泼，因此，显得比较枯燥，和其他的章节不很调和。由于本书的写作时间主要是在去年上半年，作者还来不及反映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现实，希望在有机会再版时，作者加以必要的补充。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評介。

(三) 本刊在最近时期內特別需要下列稿件：闡明毛主席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和学习心得，特別是关于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文；对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如何正确認識与运用經濟规律的論文；研究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的論文或典型調查报告；工农学哲学的体会和学习心得以及关于工农学哲学的普及与提高的經驗或論文。

(四)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內容要求密切联系实际，言之有物；稿长一般不超过五千字。來稿請用稿紙繕写清楚，并示真姓名及詳細地址(发表时笔名听便)。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由于來稿日多而本刊編輯部人力有限，退稿一般不提意見，請作者見諒。

(五) 來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六) 來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学术月刊

1959年6月号要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

- 办好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 苏紹智
- 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傅貴重
- 論生产力性质 平 心
- 必須全面地看待按劳分配原则 姜 鐸
- 試論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 杨 宽
- 上海錢庄的生产、发展与改造 中国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
- “活教育”与杜威的实用主义 陈鹤琴
- 西藏社会性质的分析 東世激
- 清代(1793年)在西藏的重要措施 朱永嘉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6期(总第18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6月20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71

刊号：(8)0368

印张：4

定价：每册二角